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三年六月

長江圖上的線索：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的歷史變遷

陳熙遠*

本文考定一幅「長江圖」殘本的製作年代，進而探掘該圖所蘊含的史料價值。該幅「長江圖」庋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儘管該圖業已修復，近年更經數位化處理，開放線上檢索瀏覽，惟因闕首殘尾，無法藉由標題或署款辨析其圖繪年代、涵蓋範圍與製作因緣。故而長年乏人問津，遑論將之運用於歷史地理的研究上。

本文先從制度史入手，以「按驥索圖」的方式，藉已知推敲未知：彙整圖上所標示的各項官方建置，包括驛站、河泊所、巡檢司、衛所與城池等，對照相關史料記載與興圖標示，檢視現存已知興遷存廢的紀錄，進而研判此圖繪製年代的上下時間斷限，並揣摩其製作目的。

地圖有其時效性，地圖繪製的年代與其呈顯的歷史樣貌本為一體兩面，一旦確定該地圖在歷史中的時間座標，便可根據地圖的時效性來「按圖索驥」，探討地圖上的歷史：尋繹在此特定時空中自然變遷或人文發展的細節與線索。該長江圖乃以建置、交通與形勝為主要的構圖基架，此三者適足反映長江圖於制度史、環境史與文化史上的研究價值。

若本文對該圖年代斷限的研判無誤，則這幅長江圖對當時地理水文、制度設置與文化景觀等，將足以作為參較勘照的重要依據。不僅有助於重新檢視過去聚訟紛紜的漢水改道問題，並可將漢口鎮興起的年代向前推移，甚至關於鸚鵡洲這座文化地標的浮沈滄桑，都可以在這幅長江圖上找到歷史的見證。

關鍵詞：長江圖 官方建置 地緣政治 環境變遷 文化地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前言・水文與人文：長江圖的基本佈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有明清檔案室，主要庋藏明清內閣大庫的冊檔，館藏極為豐富。[1] 唯藏品中地圖之屬屈指可數，目前僅見「長江圖」與「〔山西〕墩堡圖」兩幅殘卷。[2] 其中長江圖繪製精美，史語所文物陳列館於二〇〇二年重新整建開館時，即以此圖作為內閣大庫展區的首選展品之一。[3]

這幅長江彩圖殘卷未經裱褙的尺寸：左右長 417.9 公分，上下高 54.0 公分。涵蓋的空間範圍：左自湖廣岳州府臨湘縣境內的鴨欄磯，右至黃州府興國州的上山磯，橫跨了湖廣的臨湘縣、沔陽州、嘉魚縣、漢川縣、漢陽府（漢陽縣）、武昌府（江夏縣）、武昌縣、黃州府（黃岡縣）、蘄州、廣濟縣與興國州。圖中部分地名標示有字跡漫滅之虞，需藉助相關記載或方志資料參校比對，方可甄辨或推測。[4]

長江圖的構圖採取兩種並存的視角：一是從覽圖者的角度攤展檢閱，因此各個府縣衙署的建置、沿江的驛站與地名皆以直書註記；另一則猶如置身圖中，沿著長江及其支流的動線張望兩岸，或駕行於主要道路上檢視官署與城門的方位。

---

[1] 關於早期清代內閣大庫舊藏明清檔案的整理與其檔案價值的評估，投身其間的前輩學者徐中舒 (1898-1991) 先生有兩篇重要的介紹討論：〈內閣大庫檔案的由來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頁 1-14；〈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1933)：537-576；二文後皆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94-321, 322-377。近幾年隨著檔案的逐步整理並數位化，新的研究視角正待陸續開拓，參見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新史學》9.3 (1998)：135-160。

[2]「長江圖」（殘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038312；「〔山西〕墩堡圖」（殘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174374。後者頭尾亦皆殘缺，僅存山西大同城鎮羌堡至廣昌城鎮口堡一段。

[3] 該圖原經檔案整理者著錄為清代所製。筆者在以黃鶴樓為例探討文本傳統與歷史記憶時，曾經參引該圖以為佐證，見陳熙遠，〈人去樓坍水自流——試論座落在文化史上的黃鶴樓〉，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 367-416。當時即對該圖的登錄年代有所存疑，並向建檔人員議請更正，然僅耙梳若干線索，並未進行全面的檢覈，考定該圖的繪製年代。

[4] 不過仍有部分標示的地名無法明確辨識，例如殘圖右緣幾處地名已然模糊，其中一處比對廣濟縣的方志圖繪，可能是「積布磯」，但圖上的文字標示近似「雞兒磯」，兩者是否為一音之轉，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因此圖上各河泊所、茶引所等署廨的圖示不僅為純粹的符號，標示的門戶皆有特定的指向，乃由江上行船者、或陸上走馬者的視角而定。若僅以第一種覽圖者的角度觀之，則許多署廨的圖示時而斜向，時而倒置。其實這是因為一般沿江的署廨門戶多面迎川流所致，巡檢司紅色旗架的標示方向亦然。

就自然形勝而論，這幅地圖的重點無疑是長江，因此沿江的湖泊與匯注的支流皆有詳細的描繪。但此幅圖並非僅止於山川水文的狀擬，而是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換言之，圖上所勾勒的其實是人文化的自然地理。地圖上展示著官方調控的秩序：城池象徵地方政治的中心；衛所標明武裝力量的部署；稅課局攸關財政稅收；而各處河泊所則為徵收漁利的樞紐。至於沿岸的驛站，以及各驛站間距離的測量與標示，從點到線到面，在在顯示帝制中國的一統江山，是具體而微地反映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據點部署的統合畫一上，並以各種水陸交通動線予以貫通相連。

現存明代官方史書中，並未提及朝廷下達任何詔令，製作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地圖。不過，根據《明實錄》所載，洪武十六年 (1383) 七月，朱元璋曾經詔令天下都司：「凡所屬衛所、城池，及境內道里、遠近山川、險易、關津、亭堠、舟車、漕運、倉庫、郵傳、土地所產，悉繪圖以獻。」[5] 這幅圖既以長江為中心，並非以湖廣都司整個轄區的腹地為主體，亦未繪錄「土地所產」等物，應非湖廣都司當時奉命繪製進呈的「〔湖廣〕衛所城池水陸地里圖」。無論如何，這幅長江圖上確實明白標示「衛所」的位址，也勾勒「城池」的建置，不僅畫出沿岸的驛站，更以文字方塊確切註記各站間距的「地里」。因此該圖可能是湖廣都司統合轄內長江流經之區域，加以繪製而成，只是製作時間不必然是洪武年間。依此推測，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的這幅殘圖可能原只是湖廣地區的「長江水域衛所城池水陸地里圖」，前後缺斷的幅度有限。不過，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由中央彙集整條長江沿岸各地都司所進呈的圖繪資料，統籌製作出一幅完整的「長江水域衛所城池水陸地里圖」，以備通盤掌控，或呈供御覽所用。

圖上所標示的種種官方建置，各具重要功能。以這幅長江圖上的蘄州為例，

[5]《太祖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一五五，「洪武十六年七月」，頁 2416。另清初查繼佐 (1601-1676) 在其《罪惟錄》中以為此詔令是洪武十六年四月間下達，恐誤。見氏著，《罪惟錄》（收入《四部叢刊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 14-16 冊，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手稿本），卷一，頁 49。此事亦見清・張廷玉等著，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九〇，頁 2194。

我們不妨借用康熙《蘄州志》(1664) 一書對各官方建置的功能的定位：

「以禮行旅，則設有遞運所、驛站」；

「以防衛，則有巡司」；

「以水利，則有河泊所」；

「以設險守國，則有橋樑津渡」。[6]

以此對照長江圖上所標定的遞運所、驛站、河泊所與巡檢司，甚至各地橋樑津渡，顯然都是官方調控地方秩序的重要佈局。本文即先從這些制度上的設置下手，試圖尋繹可以幫助我們研判該圖繪製年代的種種蛛絲馬跡。俟掌握繪製年代之後，我們便可覆案這幅圖所可能提供的線索，以檢視攸關當時制度建置、自然環境與人文地理的若干重要課題，這些課題由於現存文獻闕如，可藉由此圖得到關鍵性的修訂或印證。

一・制度史的線索：驛站與交通動線

作為交通動線的水陸驛站，其實象徵著中央意志與權力向國家四境的展佈。嘉靖年間擔任荊州知府的陳全之 (1512-1580) 在《蓬窗日録》中狀述明代的幅員時曾提及：

我朝輿地之廣：縱二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數，具載《寰宇通志》，其延袤大略，則如此矣。[7]

陳全之述及明朝輿地縱横的涵蓋面積，並以通達四方的水路驛站里程證之，藉以闡明幅員的大略。可見驛站交通從單點到連線，以至全面的逐步佈建，是展現領土主權的關鍵。不過，陳全之此處指出《寰宇通志》具載各方水陸驛站間的里程，恐值得商榷。雖然明代確有官修《寰宇通志》一書，朝廷「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纂集而成，景泰七年 (1456) 由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 (1385-1464) 領銜進呈。然而細按現存版本，並未詳列各方水陸驛站站名與各站相距的

[6] 清・王宗堯修，盧紘纂，康熙《蘄州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據清康熙三年〔1664〕刻本影印），卷四，頁 8-10。本文為推斷長江圖的製作年代，例於引用方志之後註記其初刊年代，如「康熙《蘄州志》(1664)」。按：此處河泊所負責之「水利」，當指漁課之利，詳見本文第二節之討論。

[7] 明・陳全之，《蓬窗日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子部雜家類第 110 冊，據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祁縣知縣岳木刻本影印），卷一，頁 9。

里程。[8] 真正載明驛站里程的資料，應是修成於洪武二十七年 (1394) 的《寰宇通衢》。

中國的驛遞制度由來已久。[9] 皇朝利用水陸驛站向四方延伸，從安置驛站的據點到掌握里程的資訊，無疑是掌控國家幅員縱橫萬里的關鍵。前引康熙《蘄州志》(1664) 所謂「以禮行旅，則設有遞運所、驛站」，官方驛站的設置，雖說方便士商的交通往來，但人民的行旅若要獲得官方制度的保障，其前提是必須遵循禮法秩序的規範。換言之，帝國驛遞制度的佈建，同時兼具管控人民行動的作用。

攤開這幅長江圖殘卷，以圖上所標示的水馬驛站，對照弘治年間編定的《明會典》（弘治十五年〔1502〕成書，正德四年〔1509〕重校刊本；後簡稱《正德會典》），率皆相符。但若對照萬曆年間重修《明會典》（萬曆十五年〔1587〕；後簡稱《萬曆會典》），若干驛站已經遭到裁革。我們試以明代會典與各類方志的記載為準，將長江圖上各驛站的興革情形列表如下。表中所列志書皆附上初刊年代，以便推估長江圖製作時間的上下限，左欄為該驛站興建年代的相關記載，中間欄位表示驛站在該方志編纂時尚有載存（一般而言，方志僅著錄當地驛站的站名），右欄則是在建置之後有遷移、合併、改名或廢置等變動的紀錄。

[8] 參見明・陳循等編，《寰宇通志》（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47〕，第 37-79 冊，據明初刊本影印）。

[9] 中國驛遞制度的綜論性研究，首見於樓祖詒的《中國郵驛發達史》（昆明：中華書局，1939）。專論明代驛遞制度的演變，可參見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另仇潤喜、劉廣生編，《中國郵驛史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9）一書，彙錄歷代相關檔案史料，頗值得參考，但其中不少舛誤，須加甄別。

表一：長江圖相關驛站興革表（以下各表引文字跡漫滅者以□暫代）

長江圖驛站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蘄陽驛	黃州府蘄州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蘄州志》(1536)：洪武二年 (1369)，知府左安善創。成化中，知州莊澈、同知周仁廣修。正德間，寇燬，知州李純晸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蘭溪驛	黃州府蘄水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初，知縣趙季光建。正統中，知縣胡奎、驛丞吳思譽遷建。正德十三年，知縣王伯重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臨皐馬驛	黃州府黃岡縣			《黃州府志》(1500) 《湖廣圖經志書》(1522)：弘治間裁併入齊安驛。 《萬曆會典》(1587)：革。
齊安驛	黃州府黃岡縣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黃岡縣志》(1608)	《明實錄・孝宗實錄》弘治十一年 (1498) 二月：併湖廣黃州府臨皐馬、齊安水驛為齊安水馬驛。 《黃州府志》(1500)、《湖廣圖經志書》(1522)：弘治間，巡撫都御史沈輝奏併臨皐馬驛，知府曹廉遷建夫廠故址。 《萬曆會典》(1587)：〔改併為〕齊安水馬驛。

長江圖驛站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陽邏馬驛	黃州府黃岡縣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改併為〕陽邏水馬驛。
陽邏驛〔水驛〕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初建。正德年間，知府余貴重建。 《湖廣總志》(1591) 亦載	《正德會典》(1509)：陽邏水驛。	《黃州府志》(1500)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黃岡縣志》(1608)：〔改併為〕陽邏水馬驛。
夏口驛	武昌府江夏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洪武元年 (1368) 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原在江北，洪武九年遷江東，正德十年重建。
蒲潭驛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正德初，知府蔡欽以蒲潭驛不甚衝要，奏改為蔡店馬驛。 《萬曆會典》(1587)：革。
三漢驛	漢陽府漢陽縣			《萬曆會典》(1587)：革。 《漢陽府志》(1613)：劉家驛，成化十年(1474)，自漢陽三漢驛更來。
金口驛	武昌府江夏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簰州驛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元年 (1368) 驛丞瞿福受建。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重修嘉魚縣志》(1790)：今裁。

長江圖驛站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魚山驛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元年 (1368) 驛丞鄧宗文建。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重修嘉魚縣志》(1790)：今裁。
石頭口驛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元年 (1368) 驛丞鄧思文建。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重修嘉魚縣志》(1790)：今裁。
鴨欄驛	岳州府臨湘縣	《岳州府志》(1488)：洪武初建。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革。

表中部分驛站如臨皐驛、齊安驛，大抵可上溯到宋代的臨皐亭或齊安館。因此方志中載錄初建於洪武年間的驛站，不必然是新設，有可能是以元代的站赤 (jamci) 為基址。而「驛站」之名大抵始於蒙元時期。參與修纂《宋史》的斡玉倫徒（O'ulentu；字克莊）便曾途經這長江圖上的蘄陽驛，寄宿驛館時並題詩遣懷：

> 夜宿蘄陽驛，湍聲已慣聽。擁衾裁短句，屈指數殘更。世慮如山重，身謀似葉輕。不堪天外鴈，作急兩三聲。[10]

雖然官方志書多明白記載蘄陽驛創建於洪武二年，但從斡玉倫徒這首感懷詩作推敲，元代的蘄陽驛大抵已有基本的供宿設施，明初以之為基底進行修建。

利用長江圖上這些驛站的廢遷改併的歷史，也許可以大致推估長江圖所反映的時代。例如圖上在黃州府黃岡縣的境內分別標出陽邏水驛與陽邏馬驛兩座驛站。根據正德年間擔任按察副使的曾大有所撰之〈重修陽邏驛記〉，原建於洪武初年的陽邏水驛在正德七年 (1512) 遭遇賊匪的肆劫縱焚，整座傳舍化為煨燼。

[10] 元・斡克莊，〈宿蘄陽驛〉，明・盧希哲等修，弘治《黃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湖北省第 16 冊，據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本影印），卷七，頁 77；該詩另收錄於明・薛剛纂修，明・吳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影印），卷四，頁 44。惟該書「不堪天外鴈」作「不開天外鴈」。今從弘治《黃州府志》。

當時剛上任的知府余貴特別相度經營，重新整建，於次年三月竣工。[11] 我們無法確定當時是否即將水、馬兩驛合併，但在其修建後十年所編修的《湖廣圖經志書》(1522) 裡，陽邏水驛和陽邏馬驛似已合併，稱為「陽邏水馬驛」。因此最晚在《湖廣圖經志書》成書之前，兩站已然合併。此外，位於漢陽府漢陽縣的蒲潭驛，是在正德元年 (1506) 七月遷往蔡店，改為蔡店馬驛。[12] 再者，根據《明實錄》的記載，黃州府黃岡縣的「臨皋馬驛」與「齊安水驛」在弘治十一年 (1498) 二月併為「齊安水馬驛」。[13] 至於最早的遷改紀錄，則是成化十年 (1474)，漢陽府的三漢驛改成劉家驛。根據以上這些志書中關於驛站裁革合併等相關紀錄，長江圖應該是上述這幾間驛站在裁撤或合併之前所繪製。換言之，其製作年代的下限不會晚於成化十年。

歷來利用這段水路驛站的士商應如過江之鯽，可惜留下過訪的紀錄卻不多見。「早以儒冠對紫宸」的明代大儒羅欽順 (1465-1547) 在正德十五年 (1520) 曾從江西北上，途經湖廣一段時先以水路為主。行程中他特別有所感觸，幾乎在途次的每個驛站——從鴨欄驛、石頭口驛、魚山驛等一路——都賦詩吟詠抒

---

[11] 見明・曾大有，〈重修陽邏驛記〉，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四，頁 27-28；該文亦收入仇潤喜等，《中國郵驛史料》，頁 91-92。由於嘉靖《湖廣圖經志書》部分字跡漫滅，《中國郵驛史料》的點校提供了參考的方便。然在運用上仍需對照《湖廣圖經志書》原文為宜，例如《中國郵驛史料》裡「中有□事」實為「中有聽事」，「通觀其變」應作「適觀其變」；其注釋提及陽邏水馬驛於「弘治間改遷團風北岸」，實為張冠李戴之誤。弘治間改遷團風北岸的是李坪馬驛，而非陽邏水驛，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四，頁 30。另注釋者將文中曾大有稱余貴之職銜「大邦伯」等同於「大宗伯」，遂逕解釋為「禮部尚書」，殊不知「大邦伯」乃「知府」之尊稱。此毫釐之差竟成千里之謬，不可不辨。

[12]《明實錄・武宗實錄》，「正德元年秋七月戊寅」，頁 471。

[13]《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一三四，「弘治十一年二月庚午」，頁 2353-2354。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制度在地方區域的變化與發展，恐怕不可過於仰賴《明會典》的記載。即以弘治年間所編定的《明會典》為例，此書乃於弘治十年奉勅編纂，卷端有明孝宗（弘治十五年）與明武宗（正德四年）的兩篇序文。根據正德四年的序文，弘治十五年書成之後，正德四年一度曾經重校刊行。儘管如此，弘治十年至正德四年之間的制度變化，其實並未真正反映在該書之中。據正德四年的「凡例」所言，當時只是「重校」，並未增入後來增修的事例（「會典成於弘治十五年，凡事例、年、月、制度、數目等項，皆以本年為止。今奉旨重校，並不增入」）。因此，正德元年湖廣漢陽府蒲潭驛遷於蔡店一事，並未載於這部校勘本裡。不過，就連弘治十一年合併而成的「齊安水馬驛」也未見記載，而仍保留「臨皋馬驛」與「齊安水驛」兩個驛站。可見《明會典》雖號稱完成於弘治十五年，但弘治十年以後相關建置的興革變化，並未悉數收錄。而正德四年在進行校勘時，似乎亦未及一一加以更正。

懷。[14] 當他泊舟於漢陽城下，遠眺「隔江黃鶴亦高樓」，隨後便改走陸路，而且詩興不改，其中〈次蔡店驛〉一詩，便是描寫一行人飢腸轆轆地趕路，終於將近驛站時的情景：

一飯行行兩舍交，饑來仍念僕夫勞。驛樓已近泥途隔，笑指廚烟上柳梢。[15]

當時蒲潭驛已被蔡店驛所取代，羅欽順隔著泥途，遙望驛站廚房的裊裊炊煙，一行人彼此指點相告，喜形於色。稍後他又從蔡店驛繼續沿著陸路，進入漢川縣，朝著劉家隔的方向前進。對照長江圖的標示，圖上從漢陽往漢川的陸路上，座落著三漢驛，此三漢驛在羅欽順的時代，則已改名為「劉家驛」。換言之，在羅欽順的旅程中，長江圖上的蒲潭驛與三漢驛，早已銷聲匿跡，走進歷史。此亦符合我們對長江圖繪製年代下限的初步推斷。

長江圖上除了標明長江沿岸的驛站，亦在驛站旁以方塊文字標明驛站間的距離。關於明代各水路驛站里程的紀錄，最重要的參考資料當屬明初官方編纂的《寰宇通衢》。雖然《明實錄》載明《寰宇通衢》修成於洪武二十七年 (1394)，不過根據楊正泰《明代驛站考》的考訂，今藏於北京圖書館的明初刻本，應在永樂十一年 (1413) 之前所改定。[16] 除了官方編定的《寰宇通衢》之外，隆慶年間徽商黃汴亦曾彙整民間各種程圖路引，並且「積二十七年始成帙」，而黃汴的這部《一統路程圖記》（隆慶四年；1570），同樣詳細羅列各驛站與驛站間的距離。[17]

我們試比較長江圖所標示的驛站里程與前述諸書的記載，並列表如下，其中若有彼此相異之處，則以符號※註記。

---

[14] 諸如〈次臨湘驛〉、〈次鴨欄驛對岸〉、〈次魚山驛〉、〈過牌洲驛〉等詩，見明・羅欽順，《整菴存稿》（收入《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 345-346 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卷二〇，頁 12-14。「早以儒冠對紫宸」句出自其〈自題半影〉一詩，殆指其於弘治六年 (1493) 以未滿而立之齡以進士身分進入仕途。詩見《整菴存稿》卷二〇，頁 26。

[15] 明・羅欽順，《整菴存稿》卷二〇，頁 15。

[16] 楊正泰指出：該書內容曾提及永樂初年才設立的「北京會同館」，且書中羅列十三布政司中，並未言及設於永樂十一年的貴州布政司。見氏著，《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35。該書後並附有楊氏點校的《寰宇通衢》（附錄一）。筆者在徵引該書所載之驛站距離，仍以明初原刻本為準，見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6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影印）。

[17]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6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影印）。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亦附有該書的點校本（附錄二）。筆者徵引時仍以前書為據。

表二：長江圖上各驛站間距里程

驛站里程	長江圖標示	《寰宇通衢》「京城至湖廣布政司並所屬各府」[18]	《寰宇通衢》「京城至廣西布政司並所屬各府」[19]	《寰宇通衢》「京城至四川布政司並所屬各府各衛」[20]	《寰宇通衢》「京城至雲南布政司」[21]	《一統路程圖記》卷七：「大江源下水由夏港至無錫縣」[22]
蘄陽驛至蘭溪驛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蘭溪驛至齊安驛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齊安驛至陽邏驛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陽邏驛至夏口驛	六十里	七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夏口驛至金口驛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金口驛至簰州驛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簰州驛至魚山驛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魚山驛至石頭口驛	七十里※	七十五里※	七十五里※	七十里※	七十里※	七十五里※
石頭口驛至鴨欄驛	九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一百十里※
鴨欄驛至城陵驛	九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六十里

[18] 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頁 200。
[19] 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頁 211。
[20] 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頁 214。
[21] 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頁 230。
[22]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頁 534。唯該書將「齊安驛」寫成「高安驛」，應為誤植。

《寰宇通衢》的里程是以當時的京城（南京）為中心，出發至各地布政司之所在，沿途逐站計里。其中有前往湖廣、廣西、四川與雲南等四條路線的部分路段重疊，都會經過這幅長江圖上所標示的驛站。按理說，儘管路線不同，但若是經過同樣的路段，則各驛站間的距離應該固定不變。不過，誠如表中所列，《寰宇通衢》相關的幾條路線中，有幾處同樣從陽邏驛至夏口驛，或從魚山驛至石頭口驛，記錄的里程數值卻並不一致。《寰宇通衢》之所以出現同樣兩座驛站間有不同里程，可能是在彙整各路驛站里程時編排上的疏失。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各個路線的驛站間距乃分別（或在不同時間點上）測量所得。

長江圖上標示的里程若干處與《寰宇通衢》有所出入，例如《寰宇通衢》中石頭口驛至鴨欄驛是一百二十里，長江圖上則縮減為九十里；從鴨欄驛至城陵磯驛共六十里，但長江圖上從鴨欄驛至城陵驛則增為九十里。儘管從石頭口到城陵驛間的總和距離不變，但目前史料中並未見鴨欄驛有任何遷移的記載，有待進一步釐清。不過，顯然長江圖上所標示每個水路驛站到下個驛站的里程，並非照本抄錄《寰宇通衢》。這幅長江圖上所列之里程，極可能是當時最新實地測量的結果，而非僅拼湊舊有的書面紀錄。隨著山谷陵易、水道消長等地理環境的變化，各水路驛站間的距離當然可能有所增減。假如長江圖的繪製年代乃在《寰宇通衢》成書 (1394-1413) 之後，這份長江圖無疑可以用來校正或更新《寰宇通衢》的記載。假若《一統路程圖記》刊行於長江圖之後，何以其所載錄的路程里數反而接近長江圖之前的《寰宇通衢》？原因無他，長江圖製作時所標定的測量數值從未刊行天下，而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原非個人實測所得，恐怕是以《寰宇通衢》為藍本。

值得注意的是：長江圖和《寰宇通衢》既為官方制定，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格。相對而言，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乃供給一般士商旅程之用，因此敘述路線時，僅在兩個驛站間加註里數，並無特定的指向。反觀長江圖和《寰宇通衢》在記載里程時卻有明顯的方向性：《寰宇通衢》的水陸里程，是從當時的京城（南京）向各處布政使司及轄屬各級府縣輻射出去；同樣地，長江圖上在驛站旁記載該驛站到下個驛站的里程時，是由右至左，沿江逆流而上，和《寰宇通衢》的路程前行方向相當一致。路線的指向性可視為一種政治符碼，意味著皇朝王權從首都中央向邊陲四方輻射擴散，佈展於寰宇。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位 1403-1424）即位不久，為因應交趾政局動盪，時任北京兵部尚書的黃福 (1363-1440) 於永樂四年 (1406) 奉命督送軍餉至

安南。[23] 他特別將途中「舟車所抵，耳目所得」，寫成〈奉使安南水程日記〉。裡面曾詳細記載從永樂四年七月初一自南京出發，經過各驛站的情形。其中初九至十三日的行程，剛好涵蓋了這份長江圖的殘卷，而他所提及的每個驛站，也都一一清楚標示在這份長江圖上。根據其日記所載時間與經過的驛站，可與長江圖上的標示對照如下表：

表三：黃福奉使安南行經「長江圖」水程

驛站	所屬府縣	長江圖標示驛站里程	黃福路程（永樂四年七月）
（富池驛）	（興國州）	（無）（至蘄陽驛六十里）[24]	九日辰 (7-9) 時自富池驛出發。
蘄陽驛	黃州府蘄州	蘄陽驛至蘭溪驛一百二十里	九日午末至蘄陽驛。
蘭溪驛	黃州府蘄水縣	蘭溪驛至齊安驛六十里	十日曉至蘭溪驛。
齊安驛	黃州府黃岡縣	齊安驛至陽邏驛一百二十里	十日不午末至齊安驛。
陽邏驛	黃州府黃岡縣	陽邏驛至夏口驛六十里	十一日卯 (5-7) 時至陽邏驛。
夏口驛	武昌府江夏縣	夏口驛至金口驛六十里	十一日過午至夏口驛。（泊）
金口驛	武昌府江夏縣	金口驛至簰州驛九十里	十二日辰時出發，午末至金口驛。
簰州驛	武昌府嘉魚縣	簰州驛至魚山驛九十里	十二日逮暮至簰州驛。
魚山驛	武昌府嘉魚縣	魚山驛至石頭口驛七十里	十二日過半夜至魚山驛。
石頭口驛	武昌府嘉魚縣	石頭口驛至鴨欄驛九十里	十三日辰時至石頭口驛。
鴨欄驛	岳州府臨湘縣	鴨欄驛至城陵驛九十里	十三日交申至鴨欄驛。
（城陵驛）			十三日暮至城陵驛。

黃福日記中若有提及沿途所見驛站的相關位置，殆皆與長江圖上的標示相符，例如他乘船經過鴨欄驛時，看見「驛之前有石如砥柱，峙於邊。流轉而南，有鴨欄磯」，而且鴨欄驛的右邊有茶引批驗所與臨湘巡檢司，宛然「三衙並枕江流」。[25] 對照這幅長江圖殘卷的左緣，正是這三間衙署並列於江邊的景象。

當然，黃福在永樂四年的這趟行旅本肩負軍機要務，自然無暇盤桓逗留、訪山問水。因此他除了曾在武昌夏口驛停舟登岸之外，一路上多為「晝夜兼程」。

[23] 事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卷一五四，頁 4225。

[24] 富池驛至蘄陽驛六十里，乃根據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頁 200, 211, 214, 230）與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頁 534）所載。

[25] 明・黃福，《黃忠宣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27 冊，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馮時雍刻本影印），卷一，〈奉使安南水程日記〉，頁 1-4。

前後大約僅花上四天的功夫，便跨越這幅長江圖殘卷所涵蓋從湖北興國州到湖南臨湘縣的水程。若連富池驛到蘄陽驛的六十里也計算在內，四天的日夜奔馳，長達九百一十多里。

將近一個世紀後的趙寬 (1457-1505)，曾在其〈紀行記〉中記載一段類似的行程，恰好與黃福的奔波形成有趣的對比。趙寬是成化十七年 (1481) 的進士，當他從浙江提學副使離任，於弘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498) 自家鄉江蘇吳江啟行，準備赴任廣東按察使。當時他大概不知道這會是他人生仕途的最後一站。由於時間充裕，趙寬一路上水陸兼行，而且是停停走走：先是在弘治十一年元月十八日抵達武昌府，接受地方官長的殷勤款待，還在「茲樓幾新故」的黃鶴樓上，與布政、按察兩司諸公餞飲，並有詩作記當時盛況。[26]

趙寬在武昌總共盤桓了四晚，元月二十二日一大早才從武昌出發，接下來便走水路，當天晚上抵達並夜宿金口驛。廿四日又在嘉魚縣魚山驛停留一夜，然後再從魚山驛出發，於廿八日抵達岳州府的城陵驛。[27] 從趙寬這段路程與其間的停泊點看來，他正是沿著這幅長江圖上標定的水路驛站而行。根據圖上標示的里程計算，從武昌的夏口驛到城陵驛，總長約四百九十里，一四〇六年身負軍機重任的黃福在兩天之內披星戴月地走完；而一四九八年好整以暇的趙寬，卻足足耗上了六天的光陰，悠悠徐徐地從湖北武昌府漫遊至湖南岳州府，然後繼續他南下的旅程。

二・制度史的線索：河泊所與地方魚課

河泊所的制度，可推溯至元代。元代於江淮、建康等地設置各類河泊提領、大使或副使等官，負責魚課的徵收。[28] 明初則大規模在境內各個漁利豐富的河川或湖泊據點設置河泊所，掌收魚稅與歲貢。前引康熙《蘄州志》「以水利，則有河泊所」的定義，其中「水利」二字，當然並非「疏浚泉源」或「鑿渠灌溉」之「水利」。若根據《萬曆會典》戶部魚課所載詔令：「〔洪武〕三十年，令自懷慶

[26] 明・趙寬，《半江趙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42 冊，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趙寬刻本影印），卷一二，〈登黃鶴樓呈藩臬諸君〉，頁 24-27。

[27] 明・趙寬，《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一二，〈紀行記〉，頁 24-27。

[28] 中村治兵衛，《中国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5），頁 112-115。

以下、至沙河口一帶黃河兩岸，聽從百姓採取魚鮮食用，不收課程。原設河泊所革去、魚課開除、魚戶發回有司當差。」[29] 則以此推知河泊所主要的職掌有二：一是魚課的徵收，二是魚戶的管理。境內設有河泊所的州縣，在其方志的「田賦」或「食貨」項下，往往提點設置河泊所的功能：「立河泊所，以榷漁利，歲有常額。」[30] 不少方志甚至詳細條列出該地各個河泊所歲辦魚課的鈔額。

根據洪武十五年的統計，當時全國共設有二百五十二處河泊所。[31]《萬曆會典》載列出全國的現存河泊所，包括了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地區。[32] 不過歷朝河泊所衙門興革不一。[33]

不論是《明實錄》、《正德會典》、《萬曆會典》，或清代官修的《明史》裡，多未詳載各個河泊所建置或廢革的確切時間，我們只能從明代方志裡披沙揀金，一一推敲約略的興革情況。茲將相關史料依時序加以排比如下表，分為「興建」、「載存」與「裁廢」三項，以期掌握其沿革發展的梗概。[34] 現存史志中載錄之河泊所名稱與長江圖上的標示間有出入，茲以長江圖的標示為準，史志載錄有添餘者劃以底線，如「黃岡湖河泊所」；歧異者則以方括弧註解，如長江圖上的「馬飲河泊所」，典籍多載錄為「馬影河泊所」，在列表中則著錄為「馬影〔飲〕河泊所」。

---

[29] 見明・李東陽等奉敕著，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戶部卷三六，〈課程五・魚課〉，頁 680。

[30] 明・歐陽保等纂修，萬曆《雷州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卷九，頁 7。又如明・林燫等纂修，萬曆《福州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影印），卷七，頁 18：「國朝立河泊所，榷漁利。」

[31]《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一五〇，頁 2370。當時吏部議定：歲課糧五千石以上至萬石者設所官三人；千石以上設二人；三百石以上設一人。不過在實際施行上，河泊所設官多以一人為主。

[32] 明・李東陽等，萬曆《大明會典》卷三六，「見設河泊衙門」，頁 669-672。

[33] 關於明清河泊所機構的沿革、漁稅的徵解與漁戶的管理，可參見尹玲玲，《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第九章，頁 300-372。

[34] 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中列有「明代湖北河泊所一覽表」（頁 348-356），然似未充分運用方志，有不少缺漏處。例如關於所有隸屬於漢陽府的河泊所，其建置存廢資料盡皆付之闕如，包括「新灘河泊所」、「馬影〔飲〕河泊所」、「長江局河泊所」、「桑臺河泊所」、「三淪河泊所」、「余家湖河泊所」、「郭鄭湖河泊所」等。

表四：長江圖上河泊所興革（由左至右順江而下）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黃蓬湖河泊所	沔陽州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明實錄・武宗實錄》正德十年 (1515) 十月：革湖廣沔陽州黃蓬湖、賽港湖二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正德十年革。
黃岡河泊所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甲辰年 (1364) 所官鄭敏華建。 《湖廣圖經志書》(1522)：黃岡湖河泊所，所官鄭敏華建。……俱洪武元年創置。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黃岡湖河泊所」。	
界石河泊所	武昌府嘉魚縣			
下五湖河泊所	沔陽州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下伍〔五〕湖河泊所。 《嘉靖沔陽志》(1531)	
太平小白龜湖河泊所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甲辰年 (1364) 所官湯旺建。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太平小白龜〔湖〕河泊所。 《湖廣總志》(1591)	《萬曆會典》(1587)：久革。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新灘河泊所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皆作「新灘河泊所」。 《漢陽府志》(1546) 《湖廣總志》(1591) 《漢陽府志》(1613) 皆作「新潭湖河泊所」。	《漢陽縣志》(1748)：廢。 《漢陽府志》(1883)：（新潭湖河泊所）缺久裁廢，址不可考。
馬飲河泊所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 皆作「馬影〔飲〕河泊所」。	《漢陽府志》(1546)：馬影〔飲〕河泊所，廢。 《漢陽府志》(1883)：（馬影〔飲〕湖河泊所）缺久裁廢，址不可考。
金口河泊所	武昌府江夏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金口壇河泊所」。	
長江局河泊所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漢陽府志》(1546)：廢。 《漢陽府志》(1883)：缺久裁廢，址不可考。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桑臺河泊所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桑臺湖河泊所」。	《漢陽府志》(1613)：廢。 《漢陽府志》(1883)：（桑臺湖河泊所）缺久裁廢，址不可考。
三淪河泊所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三淪河高湖河泊所。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三淪河高湖河泊所。	《漢陽府志》(1546)：三淪湖河泊所，廢。 《漢陽府志》(1613)：三淪湖河泊所，廢。 《漢陽府志》(1883)：（三淪湖河泊所）缺久裁廢，址不可考。
余家湖河泊所	武昌府江夏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郭鄭湖河泊所	武昌府江夏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黃漢湖河泊所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俱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湖廣總志》(1591)	《萬曆會典》(1587)：嘉靖四十三年 (1564)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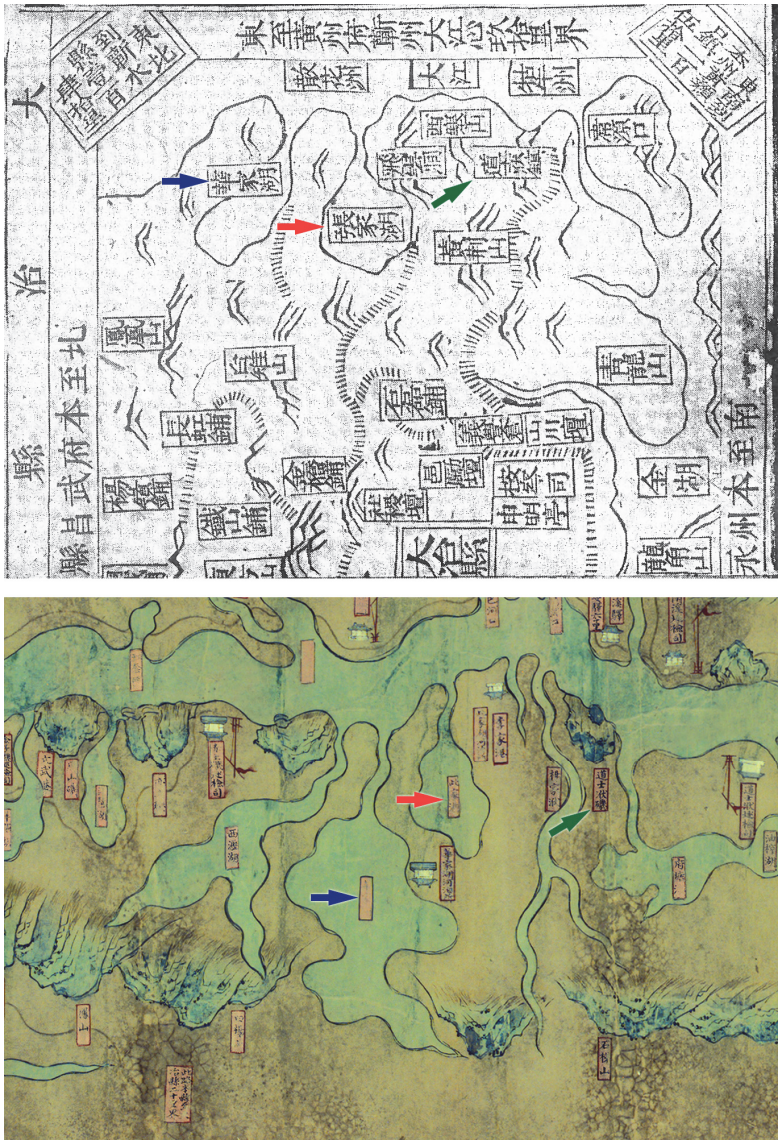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團風河泊所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團風口河泊所，俱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湖廣總志》(1591) 皆作「團風口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正德十年 (1515) 革。
鮑湖河泊所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俱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	《萬曆會典》(1587)：嘉靖四十三年 (1564) 革。
炭門湖河泊所	武昌府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三年(1370)，河泊朱政明立」、「已上俱本朝甲辰年 (1364) 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長江河泊所	武昌府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長港江套河泊所，本朝甲辰年開設，洪武三年河泊鄭演立。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長港江套河泊所」。	
磧磯河泊所	武昌府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丙午年 (1366) 開設，洪武三年河泊殷德善立。	《正德會典》(1509) 《湖廣總志》(1591)	
馬飲湖河泊所	武昌府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馬飲漿湖河泊，洪武元年開設，洪武三年，河泊劉元良立。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馬飲漿湖河泊所」。	

陳熙遠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攝湖河泊所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巴湖口灄〔攝〕湖河泊所……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巴湖口灄〔攝〕湖河泊所。 《正德會典》(1509)：巴湖口攝湖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巴湖口攝湖河泊所。	
巴湖河泊所	黃州府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巴湖口灄〔攝〕湖河泊所……俱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巴湖口灄〔攝〕湖河泊所。 《正德會典》(1509)：巴湖口攝湖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巴湖口攝湖河泊所。	
華家湖河泊所	武昌府大冶縣	《大冶縣志》(1540)：甲辰年 (1364) 開設，所官毛添福草創署事。十四年 (1381) 總旗周成起建正廳三間，私居三間，樓庫房各一間。 《湖廣圖經志書》(1522)：甲辰年 (1364) 開設，所官毛添福草創。	《正德會典》(1509) 《大冶縣志》(1540)：今仍舊。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河泊所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裁廢
此家湖河泊所	武昌府大冶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張家滘河泊所，甲辰年 (1364) 開設，所官管德旺創建。《大冶縣志》(1540)：張家滘河泊所，甲辰年開設，所官管德旺創建署事。十四年 (1381) 總旗龔昌建正廳私居房各三間，庫房門樓各一門。	《正德會典》(1509)《萬曆會典》(1587)《湖廣總志》(1591)皆作「張家滘河泊所」。	
楊瀝湖河泊所	黃州府蘄水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陽歷〔楊瀝〕湖河泊所，洪武中知縣陳得義建。	《黃州府志》(1500)《正德會典》(1509)《湖廣總志》(1591)皆作「楊歷〔瀝〕湖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楊歷〔瀝〕湖河泊所，萬曆九年 (1581) 革。
漳源河泊所	武昌府興國州		《正德會典》(1509)《湖廣圖經志書》(1522)《湖廣總志》(1591)：漳源湖河泊所。	
海口河泊所	武昌府興國州		《正德會典》(1509)《湖廣圖經志書》(1522)《湖廣總志》(1591)皆作「海口湖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海口湖河泊所，萬曆九年 (1581) 革。
馬口河泊所	黃州府廣濟縣		《正德會典》(1509)《湖廣圖經志書》(1522)皆作「馬口湖河泊所」。	《萬曆會典》(1587)：馬口湖河泊所，隆慶二年 (1568) 革。

在彙整長江圖上河泊所的過程中，少數河泊所的名稱與志書所載出入較大，必須細加研判。其中位於武昌府大冶縣「此家湖」旁的「此家湖河泊所」，未見於任何現存的典志記載，惟對比《大冶縣志》的記載與縣境圖的相關位置（見圖一），長江圖上的這座「此家湖」既位於華家湖的右側、「道士伏磯」的左側，應該即是志書所列的「張家滘」，設有「張家滘河泊所」管理魚課。因此可能是畫工的誤筆或誤認（「張」之草書與「此」字相近），以致有此魚魯豕亥之失。



圖一：大冶縣志之圖（《大冶縣志》〔1540〕）與長江圖相應部分對比

根據上表，漢陽府漢陽縣的馬飲河泊所、長江局河泊所與三淪河泊所在嘉靖元年編纂的《湖廣圖經志書》(1522) 裡仍然載存，但在嘉靖二十五年編纂《漢陽府志》(1546) 裡，則皆已註明廢置。可見三者就在嘉靖元年至二十五年之間遭到裁革。不過，表中隸屬沔陽縣的「黃蓬湖河泊所」，儘管在《湖廣圖經志書》(1522) 中仍有載存，但根據《明實錄》，正德十年 (1515) 十月，湖廣沔陽州黃蓬湖、賽港湖二河泊所，已遭裁革。而官方主要的考慮，可見於當時擔任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 (1467-1544) 的題本。秦金在正德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建言朝廷「裁革多官以省冗費」，其中經查許家池河泊所徵收錢糧數少，又與黃蓬湖水口相連，因此擬將黃蓬湖省併入許家池河泊所。[35]

長江圖上最早遭到裁併的河泊所是位於黃州府黃岡縣的攝湖河泊所與巴湖河泊所，在圖上此兩者的位置本就非常鄰近，在弘治十五年完成、正德四年 (1509) 修訂的《正德會典》裡，此兩間河泊所已經合併為「巴湖口攝湖河泊所」。根據這些河泊所的沿革記載來考定長江圖製作的時間，與前一節我們利用驛站的遷廢線索，所檢校出來的初步結果，基本上頗為相近，可以確定這幅長江圖當在正德 (1506-1521) 以前完成。

當然，我們不能只留意出現在圖上的官方建置，沒有或尚未出現在圖上的線索，可能更具參考與對照的價值。例如長江圖標出當初所有沿江臨湖的河泊所，不僅有署廨的圖標，並在其旁以方框註明「某某河泊所」。根據弘治元年的《岳州府志》(1488)，岳州府臨湘縣在縣東南二里的連家湖設有河泊所，不過這幅長江圖殘卷的左下角，雖清楚標出整座「連家湖」，但未見有「連家湖河泊所」的圖標。同樣在長江圖殘卷左側邊緣標有「稅課局」，但根據《岳州府志》的記載，當時位於縣南的「稅課局」卻已經裁革。由此可以佐證：這幅長江圖應是在該地河泊所設立之前、而稅課局尚未廢置之前所繪；換言之，長江圖繪製年代的下限，可以再往前推移，應該不會晚於憲宗成化年間 (1465-1487)。

三・制度史的線索：巡檢司與關津要道的控管

除了驛站與河泊所之外，長江圖上還有一個重要官方建置，即是在許多關津

[35] 明・秦金，《安楚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 433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二，頁 1-7。

要道所設置的巡檢司。圖上除了具體繪出巡檢司的官署之外，並且在其旁標注相當顯眼的紅色旗桿。[36] 朱元璋曾於洪武十三年二月敕諭天下的膺任巡檢的官員，特別揭櫫設置巡檢司的用意與考課的獎懲原則：

> 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道，察姦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諭以巡防有道，譏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37]

巡檢無疑是府州縣治面對城外鞭長莫及之處，延展其控制力量的重要據點。當然，巡檢坐鎮關津要道，必然是人民聚集或商旅往來頻繁之處。因此隨著地區的開發，政府會因應需求增設巡檢，以維繫關津要道的行旅秩序與居住安全。例如英宗正統五年 (1440)，朝廷順應地方民情所需，在蘄州的大同鎮設置巡檢司：

> 設湖廣蘄州大同鎮巡檢司，以其地去州治三百餘里，山深多盜，居民請設官警邏故也。[38]

顯然大同鎮當地有一定的聚落發展，而州政府鞭長莫及，因此透過巡檢司的設置，負責該地緝盜巡邏的治安。由此可見：巡檢司無疑是以州縣城市為中心向外伸展的指爪，代理州治或縣治來維繫當地居民的安危。

清初大儒顧炎武 (1613-1682) 在《日知錄》中曾對明代巡檢制度的演變，有段語重心長的批評；他認為洪武年間特別重視巡檢制度，不僅頒佈敕文，又「定為考課之法」。但自從弘治以降，官方多將各地巡檢司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隨著巡檢的裁減，總督則不斷增設。然而巡檢與總督的功能實有根本的差

---

[36] 明代巡檢制度的專題研究，目前有呂進貴，《明代的巡檢制度：地方治安基層組織及其運作》（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該書有附表羅列各地方巡檢司的遷革（頁 165-222），可惜該表僅利用《明會典》與《明史》的簡略記載，對稽核地方實際的設立或遷革的具體情況，掌握不免受限。

[37]《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一三〇，頁 2059-2060。按：原文「巡檢」皆作「巡檢」。又《全明文》亦收錄朱元璋〈諭各處巡檢〉，唯內容稍異：「朕設巡檢，扼要道，驗關津，察姦偽，必士民之樂業，致商旅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能，未經點督，今特差人詣所在，諭以巡防有道，譏察多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靖所司，秩滿來朝，朕必嘉焉。故茲敕諭。」見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七，頁 96。

[38]《明實錄・英宗實錄》卷六七，頁 1295。

異——「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39] 對顧炎武而言，明末地方秩序的崩解，與巡檢制度的逐步崩解有一定的關係。

回到本文關注的長江圖製作年代問題，我們利用會典、實錄與方志中的相關記載，嘗試將長江圖上所標示出巡檢司的沿革列表如後。

表五：長江圖所載巡檢司沿革（由左至右順江而下）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鴨欄巡檢司	岳州府臨湘縣	《岳州府志》(1488) 《湖廣圖經志書》(1522)：國初建，成化初，知府吳節重建。	《正德會典》(1509) 《岳州府志》(157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石頭口巡檢司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石頭口巡檢司，洪武元年(1368) 巡檢謝希顏建。 《湖廣圖經志書》(1522)：石頭口鎮巡檢司，洪武元年巡檢謝希顏建。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石頭口鎮巡檢司。	
簰州巡檢司	武昌府嘉魚縣	《嘉魚縣志》(1449)：簰州巡檢司，洪武元年巡檢李顏建。 《湖廣圖經志書》(1522)：簰州鎮巡檢司，洪武元年巡檢李顏建。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簰州鎮巡檢司」。	

[39]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唯一書業中心，1975），卷一一，〈鄉亭之職〉，頁 233。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新灘巡檢司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新灘鎮巡檢司」。	
百人磯巡檢司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百八〔人〕磯鎮巡檢司。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皆作「百人磯鎮巡檢司」。	《漢陽府志》(1546) 《漢陽府志》(1613) 皆作「百人磯鎮巡檢司，舊在縣治南六十里，今遷東江腦」。
金口巡檢司	武昌府江夏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 皆載「金口鎮巡檢司，洪武己巳年(1389) 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皆作「金口鎮巡檢司」。	
沌口巡檢司	漢陽府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漢陽府志》(1613) 皆作「沌口鎮巡檢司」。	《漢陽府志》(1883)：沌口巡檢署，《舊志》明置巡檢於沌口鎮，季年流賊肆擾，鎮遂廢。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鮎魚口巡檢司	武昌府 江夏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皆載「鮎魚口鎮巡檢司，洪武丁未(1367)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皆作「鮎魚口鎮巡檢司」。	
漢口巡檢司	漢陽府 漢陽縣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皆作「漢口鎮巡檢司」。	《漢陽府志》(1613)：先在縣治北、漢水南岸。今奉兩臺詳允，改建北鎮循禮坊。
滸黃洲巡檢司	武昌府 江夏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皆載「滸黃洲鎮巡檢司，洪武甲辰(1364)年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皆作「滸黃洲鎮巡檢司」。	
陽邏巡檢司	黃州府 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陽邏鎮巡檢司，俱洪武初年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黃岡縣志》(1608)	
白湖鎮巡檢司	武昌府 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三年巡檢郎均壁創置……已上俱本朝甲辰年開設。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團風鎮巡檢司	黃州府 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俱洪武初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黃岡縣志》(1608)	
三江口巡檢司	武昌府 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三江口鎮巡檢司，洪武元年巡檢李燦佑創。	《正德會典》(1509) 《湖廣總志》(1591)皆作「三江口鎮巡檢司」。	《萬曆會典》(1587)：赤石磯鎮、三江口鎮各巡檢司，俱革。 《武昌縣志》(1885)：三江口鎮在縣西三十里，左通團風，右通七磯。明初設巡檢司，嘉靖中省。
赤壁巡檢司	黃州府 黃岡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俱洪武初建。	《正德會典》(1509)：赤壁磯鎮巡檢司。	《黃州府志》(1500)：赤壁磯鎮巡檢司，在府城南三里許，濱江，臨皐驛舊址，弘治己未 (1499) 改為巡司。 《湖廣總志》(1591)：赤壁磯巡檢司，在清源門外；今革。 《黃岡縣志》(1608)：赤壁巡〔檢〕司，嘉靖癸亥 (1563) 罷。
金子磯巡檢司	武昌府 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金子磯鎮巡檢司，洪武二年巡檢王吉創立」、「已上俱本朝甲辰年開設」。	《正德會典》(1509)：金子磯鎮巡檢司。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明實錄・英宗實錄》正統十三年 (1448) 十月：徙湖廣武昌縣金子磯鎮巡檢司於樊口港。 《湖廣圖經志書》(1522)：正統間，儒學教諭杜巽奏遷今所。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赤土磯巡檢司	武昌府 武昌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赤土磯鎮巡檢司，洪武三年巡檢王德創立」、「已上俱本朝甲辰年開設」。	《正德會典》(1509)：赤石磯鎮巡檢司。 《湖廣總志》(1591)：赤土磯鎮巡檢司。	《明實錄・憲宗實錄》成化十三年(1477) 十月：改湖廣・武昌縣・赤土磯巡檢司為羊樓巡檢司，隸蒲圻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赤土磯鎮巡檢司，今圮。 《萬曆會典》(1587)：赤石磯鎮、三江口鎮各巡檢司，俱革。
巴河鎮巡檢司	黃州府 蘄水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初，知縣趙季光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巴河〔鎮〕巡檢司。	
蘭溪巡檢司	黃州府 蘄水縣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甲寅(1374) 知縣趙季光、巡檢鮮于吉建。	《黃州府志》(1500)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道士洑巡檢司	武昌府 大冶縣	《大冶縣志》(1540)：洪武元年開設，巡檢陳□質草創署事。八年，巡檢戴順建正廳、泊水各三間，耳房三間，鼓樓三間，官房、司房各六間，弓兵窩鋪三十間，批引所□□間。	《正德會典》(1509)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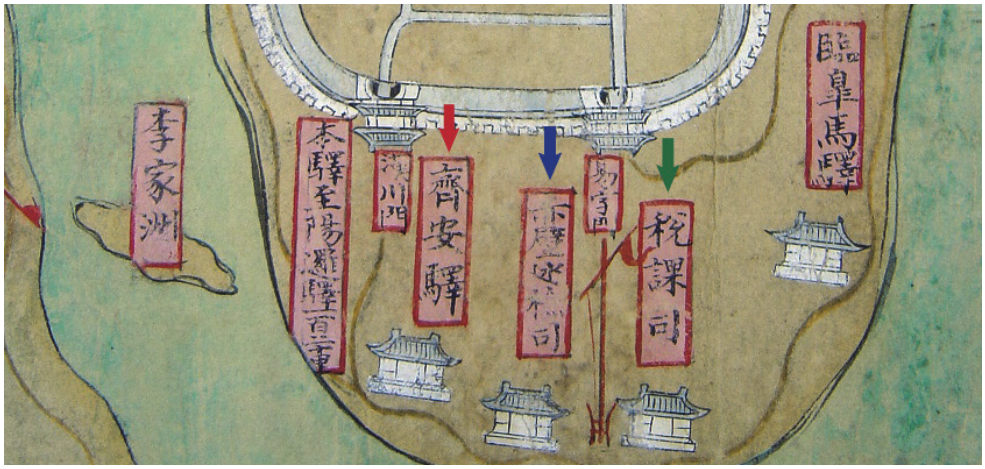
長江圖巡檢司	府縣	沿革		
		興建	載存	遷／廢
茅山巡檢司	黃州府蘄州	《嘉靖蘄州志》(1529)：茅山鎮巡檢司，洪武二年知府左安善創建。	《黃州府志》(1500)：茅山鎮巡檢司。 《正德會典》(1509) 《萬曆會典》(1587) 《湖廣總志》(1591)：茅山鎮巡檢司。	
黃顙口巡檢司	武昌府興國州		《正德會典》(1509)：黃顙口鎮巡檢司。 《湖廣圖經志書》(1522) 《萬曆會典》(1587)：黃顙口鎮巡檢司。 《湖廣總志》(1591)：黃顙口鎮巡檢司。	

綜觀上表，長江圖上從岳州府臨湘縣到武昌府興國州的巡檢司，大部分皆設於洪武初年，有些甚至是在他仍為「吳王」時所建置。[40] 顯然在朱元璋逐鹿天下

[40] 有學者曾檢視明代湖北所轄八府（武昌、漢陽、黃州、承天、德安、荊州、襄陽與鄖陽）之巡檢司的設置與分佈，進而列表、論證明代湖北八府約共九十個巡檢司，大多分別設置於洪武與成化兩個時期。見王偉凱，〈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檢司設置與分布〉，《湖北大學學報》33.3 (2006)：365-369。可惜作者對相關文獻的解讀，特別是年代的斷定上多不求甚解，往往將明初即已設置的巡檢司誤判為成化年間新建。例如他將武昌府江夏縣的滸黃洲鎮巡檢司的設立年代，斷定為成化二十年 (1484)（見「表二」）。其實《湖廣圖經志書》所謂的「本朝甲辰年開設」，是指「洪武甲辰年」(1364)，亦即元順帝至正廿四年 (1364)，雖然當時明朝尚未建立，朱元璋也尚未登極建元「洪武」，但已在所統屬的區域進行部署與建置，志書上以「洪武」冠於干支之上，乃是藉用年號以代稱廟號。萬曆《湖廣總志》便明白註明是「洪武甲辰年」（頁 502）。同樣地，作者將武昌府江夏縣鮎魚口巡檢司的設置時間，斷定為成化二十三年 (1487)，同樣誤讀了《湖廣圖經志書》所述「丁

之際，以及在江山底定之初，巡檢司發揮一定穩定地方秩序的功能，此所以他即位後相當重視巡檢司在各個關津要道，確實執行巡防譏察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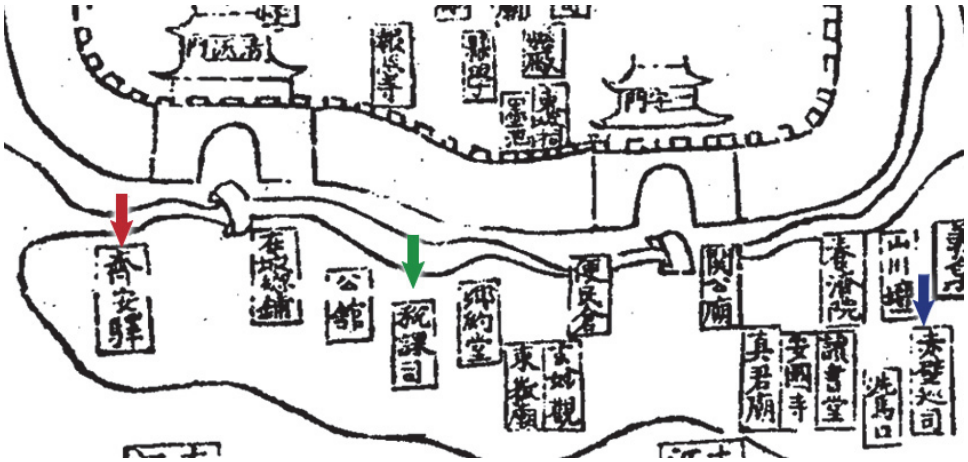
上表中位於黃州府黃岡縣的赤壁巡檢司，其遷移沿革最為曲折：長江圖上的赤壁巡檢司位於府城南方，在齊安驛與稅課司的中間。而當時臨皐馬驛仍在。根據《黃州府志》(1500) 所載，弘治十二年 (1499) 時官方以臨皐驛的舊址改為赤壁磯鎮巡檢司。[41]（比較圖二、圖三）



圖二：長江圖黃岡縣（部分）

未開設」的意思（卷二，頁 135）。清・王庭禎修，清・彭崧毓纂，同治《江夏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 32 冊，據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影印）清楚載明是「洪武丁未」(1367) 所設（頁 41）。另外作者將武昌府江夏縣的金口鎮巡檢司斷定為「正統十四年 (1449)」（「表三」），但根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所載，金口鎮巡檢司是於「己巳年開設」（卷二，頁 135），所謂「己巳年」，是指「洪武己巳年 (1389)」，亦可對照同治《江夏縣志》（頁 41）。干支紀年一旦判讀錯誤，便相差六十年、甚至一百二十年之久，這些錯誤當然影響到作者在解讀明代巡檢司增設的因緣，關係甚鉅，不可不辨。在本文探討的這幅長江圖上，都可以找到上述三座巡檢司的位置，若我們所考訂該圖製作年代的斷限可以成立，這三處巡檢司早在正統之前便已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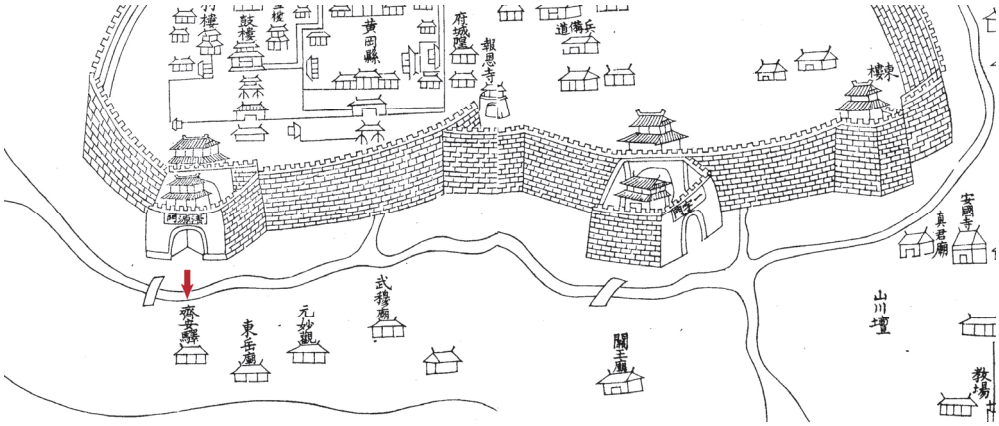
[41] 弘治《黃州府志》(1500) 卷四，頁 64。



圖三：黃岡縣圖（部分）（《黃州府志》〔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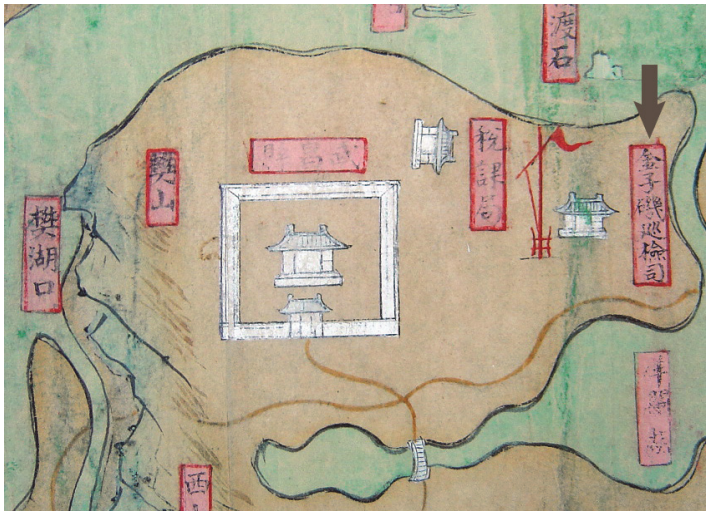
但在《湖廣圖經志書》(1522) 的黃岡縣圖中，赤壁磯巡檢司的位址又改回清源門外，位於稅課司的西側，似乎又遷回原來長江圖上的位置。（參見圖四）根據萬曆三十六年修纂成書的《黃岡縣志》(1608)，赤壁巡司曾在嘉靖四十二年 (1563) 罷革，不過到了萬曆二年 (1574)，又因當地「盜警」頻傳，因此特別在三江口增置守備司，後因公署頹圮，便移駐到議革赤壁巡司的舊署。（參見圖五）

圖四：黃岡縣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圖五：黃岡郡城圖（《黃岡縣志》〔1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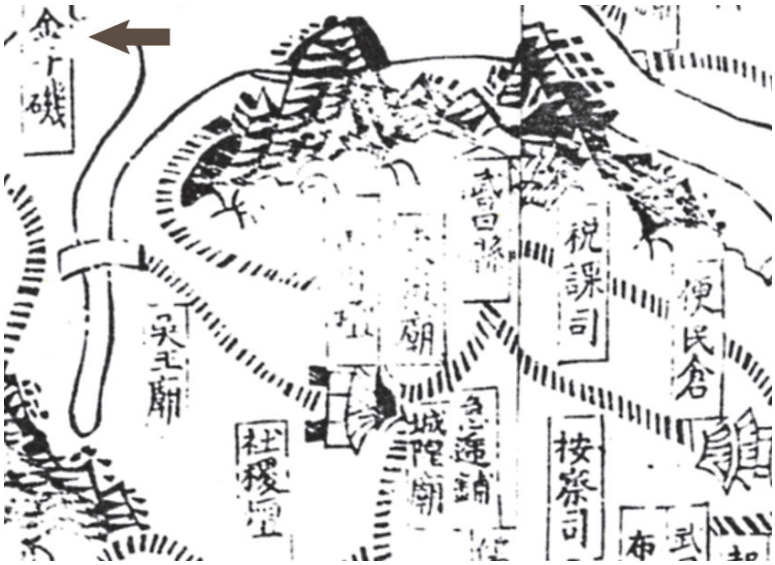
一條對研判長江圖製作年代的重要線索是：位於圖上武昌縣東邊的金子磯巡檢司，在正統十三年 (1448)，朝廷採納該縣儒學教諭杜巽的建言，將該巡檢司由縣東遷往縣西的樊口港。[42] 主要的考量是樊口港「路當要衝」，因此「商賈甚便」。[43] 該地既處交通要道，商旅往來頻繁，更需要有官方巡防的部署，以維持當地秩序。（比對圖六、圖七）換言之，長江圖所勾勒的是金子磯巡檢司西遷前的景況，亦即正統十三年之前的建制佈局。據此我們所考定製圖年代的下限也可以再往前推移。



圖六：長江圖武昌縣部分。金子磯巡檢司原在縣東

[42]《明實錄・英宗實錄》卷一七一，頁 3295。

[43]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二，頁 45-46。



圖七：武昌縣城圖（《湖廣圖經志書》〔1522〕）。金子磯巡檢司已移至縣西

四・制度史的線索：駐防衛所與王府護衛

衛所為明朝軍事制度的根本。[44] 元末軍興時，朱元璋即開始採用以此一編制整軍經武。至於大規模的佈建，則始於元至正二十四年 (1364)。這幅長江圖的繪製目的既在展現官方建置的地理分佈，駐防各地的衛所不容或缺。的確，在這幅長江圖上，除了各府州縣治的官署外，在各城池腹地裡，最重要的標的建置即是衛所，包括蘄州、黃州府、武昌府與漢陽府等地，不僅清楚標出「衛」衙所在之處，甚至連中、前、左、右、後等各「所」署的相關位置，也都一一詳加註明。

[44] 關於明代衛所的研究，早期的研究首推吳晗 (1909-1969)〈明代的軍兵〉一文，刊於《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2 (1937)：147-200。該文綱舉目張，對明代軍、兵的區分，京、衛軍的廢弛，軍餉與國家財政等課題，進行概要的勾勒。此後中日學者陸續發表相關研究，于志嘉在〈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作了精要的評介。該文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 515-540。至於如何運用明代官方文書探討衛所制度的沿革，以及可能遭遇的限制，並參見于志嘉，〈明檔案的利用與明代衛所制度研究〉，《大陸雜誌》99.5 (1999)：9-26。

表六：長江圖衛所興革表

衛所	所在府縣	沿革	
		興建	改／裁／調
蘄州衛（附左、右、中、前、後五所）	黃州府蘄州	《大明一統志》(1461)：蘄州衛，在州治西，洪武十二年建。 《黃州府志》(1500)、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初，指揮趙應，千戶許勝剏建，後指揮朱德重建。 《蘄州志》(1536)：始於元末。洪武十一年 (1378) 改守禦所置為衛，增建中、前、後、左、右五所。 《湖廣總志》(1591)：洪武甲辰 (1364)，指揮趙應、千戶許勝協力共建。	《明實錄・英宗實錄》正統八年 (1443) 二月：以蘄州衛為〔荊〕王府。 《黃州府志》(1500)、 《湖廣圖經志書》(1522)：原地改建為王府；正統間，搬遷至城西的旬宣門內。 《蘄州志》(1536)
黃州衛（附左、右、中、前、後五所）		《大明一統志》(1461)：黃州衛，在府治東北。洪武元年建，三年改為千戶所，十二年復為衛。 《黃州府志》(1500)：甲辰 (1364) 年建。	《湖廣圖經志書》(1522)：永樂六年 (1408) 指揮使郭顯重修，並以右、中、前、後四所附焉。 《黃岡縣志》(1608)：國初建，洪武庚戌 (1370) 改為千戶所，己未 (1379) 復立衛。
武昌衛	武昌府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二十年建，經歷司、衛鎮撫，左、中、前三所附焉。	
武昌中護衛	武昌府		《明實錄・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四月：改「武昌護衛」為「中護衛」。 《明實錄・宣宗實錄》宣德五年 (1430) 十一月：改「武昌中護衛」為「武昌護衛」。 《湖廣圖經志書》(1522)：永樂初，楚王進還二護衛，止留此衛〔中護衛〕。 《湖廣總志》(1591)：永樂中，奏辭二衛，今為衛一。

衛所	所在府縣	沿革	
		興建	改／裁／調
武昌左護衛	武昌府		《明實錄・宣宗實錄》宣德五年(1430) 十一月：調〔武昌〕左護衛於〔山東〕東昌，改為「東昌衛」。
武昌右護衛	武昌府		《明實錄・宣宗實錄》宣德五年(1430) 十一月：調〔武昌〕右護衛於〔江蘇〕徐州，改為「徐州左衛」。
武昌左衛	武昌府	《湖廣圖經志書》(1522)：洪武中建，經歷司衛鎮撫，左、右、中、前、後五所附焉。	
武昌右所	漢陽府	《湖廣圖經志書》(1522)：右千戶所，在南紀門內，千戶密福建。弘治間，千戶陳山修。正德間，千戶朱鳳、陶震重脩。	
武昌後所	漢陽府	《湖廣圖經志書》(1522)：後千戶所，在鳳山門內，二所俱隸武昌衛。正統十三年奏准撥護漢陽。弘治間，千戶李經重建。正德間，千戶李鶴重脩。	

位於這幅長江圖最右側的是蘄州衛，蘄州乃屬黃州府，若按照長江圖的驛站里程，從蘄州的蘄陽驛順江往西行一百八十里，途經蘭溪驛至齊安驛，即抵達黃州府府城。黃州府與黃岡縣乃府縣同城，城內亦置有黃州衛。除了衛署外，長江圖上在蘄州、黃州兩地都不憚其煩地示出左、右、中、前、後五所的位置。

按照李賢 (1408-1466) 與彭時 (1416-1475) 等人奉敕修撰，完成於天順五年的《大明一統志》(1461) 所述：「黃州衛，在府治東北，洪武元年建，三年改為

千戶所，十二年復為衛。蘄州衛，在州治西，洪武十二年建。」[45] 似乎黃州與蘄州二衛的建置時間先後不一。而《大明一統志》對此二衛肇建年代的斷定，多為後代學者所襲用，如清初顧祖禹 (1631-1692) 於康熙中葉完成的鉅作《讀史方輿紀要》。[46] 然而，儘管《大明一統志》編輯成書年代，早於現存大部分個別的府州縣等地方志書，但記載往往過於簡略，時有失之精確處。

對比之下，嘉靖《蘄州志》(1536) 對蘄州衛的興革過程提供了比較翔實的記載。該志將蘄州衛的肇始上溯至「元末」。所謂「元末」，指的是朱元璋於甲辰年即吳王位之時，派遣指揮趙應清、千戶許勝、陳遏率其部伍守禦蘄州。逮洪武二年 (1369)，將其中陳遏領導的千戶所調往武昌，而以許勝所率軍卒立為守禦千戶所，正式「創建衙門」。洪武十一年八月，指揮朱德率領鳳陽操軍四千戶所調至蘄州，即將守禦所改置為衛，同時增建中、前、後、左、右五所。[47] 因此嚴格而言，蘄州衛的雛形可溯自「元末」甲辰年，但由守禦千戶所正式升級為蘄州衛，則是在洪武十一年。《大明一統志》的簡略記載恐不足為據。若按照嘉靖《蘄州志》的記載，蘄州衛指揮朱德的確曾經在洪武十二年有所作為，但主要是闢建演武廳校場：「相度東郊，闢演武廳校場，東西闊五十八丈，南北長一百六十九丈，麗廳事三楹，名演武。」[48]

長江圖上的黃州府城內，除了黃州府署與黃岡縣治之外，並明白標示黃州衛與各所的位置。至於黃州衛的建置因緣，依照弘治《黃州府志》(1500) 所載，同樣可溯自甲辰年 (1364) 指揮黃榮屯兵於該地。洪武三年，一度改千戶所為百戶。直到洪武十二年，才調派鳳陽指揮僉事李和領軍到此「備立黃州衛」。[49] 再以萬曆《黃岡縣志》(1608) 對勘：「黃州衛，在縣治北。國初指揮黃榮建。洪武

---

[45] 明・李賢等修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影印），第 7 冊，卷六一，頁 3785。

[46]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607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六七，頁 586。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利用《明會典》、《明實錄》與《明史》所統列的「明代湖廣境內設衛一覽表」，在「黃州衛」與「蘄州衛」欄下，皆註明為「洪武十二年建」，見頁 40。

[47] 詳見明・甘澤纂輯，明・趙士讓編次，明・王舜卿校正，嘉靖《蘄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湖北省第 16 冊，據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十五年〔1536〕補刻本影印），卷五，頁 551。按：嘉靖《蘄州志》中所提及之指揮趙應清，於《湖廣圖經志書》(1522)（卷四，頁 336）、《湖廣總志》(1591)（卷一三，頁 507）等書中皆作「趙應」。

[48] 詳見嘉靖《蘄州志》(1536) 卷五，頁 551。

[49]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67。

庚戌（三年；1370）改為千戶所，己未（十二年；1379）復立衛。」[50]《黃岡縣志》所謂「國初」，並非洪武元年，黃榮是在「甲辰年」駐兵於此，但其時尚未正式建立黃州衛。由此可見，《大明一統志》所載黃州衛建於洪武元年，並非實情。軍事的建置往往是與時俱進、逐步演化的過程。元末軍興之際，朱元璋在不少戰略要地部署兵力，迨至登極建元之後，軍事駐防與守禦勢必納入考量，將原先戰時屯兵之處發展成常駐的衛所。從衙署、校場等硬體設施的修建擴充，到各指揮層級的員額編制，漸次齊備，[51] 實皆反映在蘄州與黃州兩衛的建置歷程中。

同樣就在永樂六年，指揮使郭顯重修，有經歷司、鎮撫司，並以右、中、前、後四所附焉。[52] 在長江圖上恰好反映出來這些衛所的位置。據此，長江圖製作時間應在永樂六年之後。

就考定長江圖繪製時間而言，圖上所列的衛所若曾經在某個時期進行增遷裁革的調整，無疑可以提供我們研判年代的參照依據。例如蘄州衛衛署原本座落於州西麒麟山的南方，正統八年時因以基址改建為荊王府，因此遷於旬宣門內，以廣儲倉舊址重建。[53] 反觀長江圖上的蘄州衛所在地，正位於麒麟山之陽，尚未改建為「荊王府」；換言之，圖上所示是在正統八年 (1443) 之前的建置狀況，亦即長江圖的製作年代不會晚於此時。

不過，研判長江圖製作年代斷限最為關鍵的線索，其實是楚王藩邸的所在地——武昌府。[54] 在長江圖上的武昌府城裡，不僅圖示出武昌府、江夏縣、湖廣按察司、布政司等官署，更仔細註記武昌左、中、右三護衛及各所的位置。（參見圖八）不過，武昌衛不僅駐防於武昌府，武昌衛的右、後兩千戶所的駐防地設於

---

[50] 明・茅瑞徵修，明・呂元音等纂，萬曆《黃岡縣志》（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光緒十六年〔1890〕重刊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修朱印本），卷二，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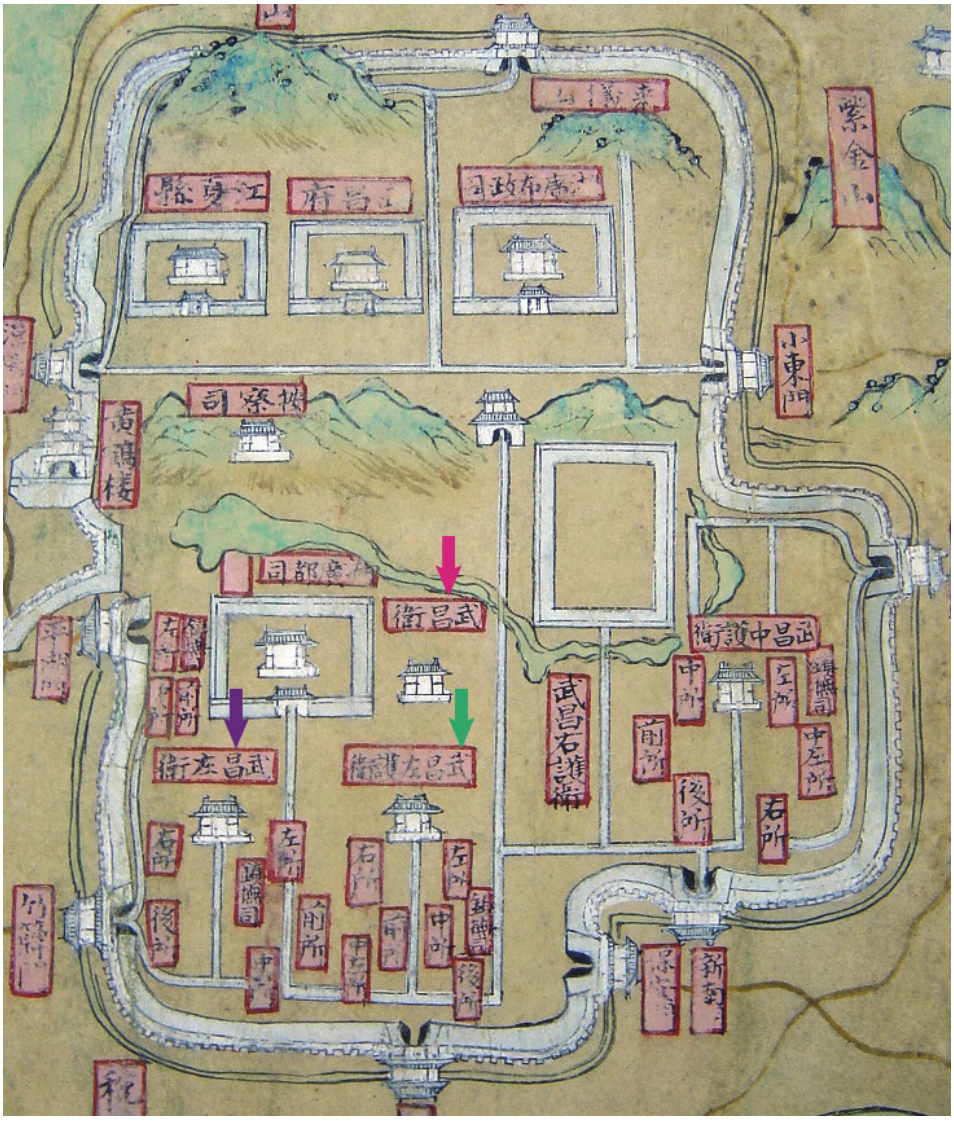
[51] 據弘治《黃州府志》(1500) 所載，當時蘄州衛的編制有：指揮五員，指揮同知三員，指揮僉事八員，經歷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司吏一名），衛鎮撫司三員。左、右、中、前、後五所，正千戶共十員，副千戶共二十員（司吏共五名），五所百戶共四十七員，鎮撫共五員。本衛六房（令史共二名、典史共一十二名）。黃州衛的編制則有：指揮使五員，指揮同知五員，指揮僉事七員，經歷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司吏一名），衛鎮撫二員（司吏一名）。左、右、前、後四千戶所，正千戶共九員，副千戶共十五員（司吏共四名），四千戶所共四十員，鎮撫共五員。本衛六房（令史共二名、典史共一十二名）。見頁 54。

[52]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67；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6。

[53]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6；嘉靖《蘄州志》(1536) 卷五，頁 551。

[54] 關於明代王府的建置與沿革，參見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9），頁 245-355，其中第二部四、五兩章特別處理楚王府的內部管理與財政問題。

漢陽府：右千戶所位於南紀門內，後千戶所則位於鳳山門內。洪武初年便將此二千戶所調派至漢陽府守禦，直到正統十三年 (1448) 才播隸漢陽府。[55]



圖八：長江圖武昌府部分

[55] 明・賈應春修，明・朱衣纂，嘉靖《漢陽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湖北省第 16 冊，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刻本〔1546〕影印），卷九，頁 4；明・徐學謨纂修，萬曆《湖廣總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94-196 冊，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1591〕刻本影印），頁 530。

根據洪武初年劉基 (1311-1375) 等人編撰的《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朱元璋於「甲辰年 (1364)」將蒙元時期的武昌路改制為武昌府，隨後「洪武三年 (1370) 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56] 然而這項記載容易誤導讀者，以為楚王府乃建立於洪武三年。[57] 事實上，洪武三年只是形式上封楚王朱楨 (1364-1424) 於武昌府。按照明抄本《秘閣元龜政要》所載，直到洪武六年閏十一月，朝廷才派遣定遼都指揮同知胡泉於武昌督造楚王府。胡泉即是楚王朱楨生母昭敬皇妃的兄長；換言之，明太祖是將楚王府的建造工程責成楚王的母舅督辦。[58] 而朱楨要到洪武十四年才正式赴武昌就藩。在這幅長江圖上並未用文字註明「楚王府」；僅在藩府的位置上標以長方形的空白區塊。[59] 之所以如此處理，可能是因為此圖的目的在於標示地方官署與衛所的建置。與皇室血脈相連的王府，與一般地方行政轄區自不宜等量齊觀。[60]

洪武二十三年 (1390) 朝廷將「武昌護衛」改名為「武昌中護衛」，同時並有若干人事的調整。[61] 對照這幅長江圖，武昌府城內的相關位置上所標示的正是改名以後的「武昌中護衛」。

在明太祖逝世之後，中央朝廷對駐紮於重鎮且尾大不掉的藩王武力，一直深具戒心。建文帝朱允炆（1377-?；在位 1399-1402）試圖進行一系列的削藩改制，卻因此打草驚蛇，導致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而朱棣假借「靖難」之名攫取政權，正因本身坐擁北京重兵，當然也深諳：地方藩王一旦坐大，勢必危及中央皇權。永樂三年六月戊辰朔，湖廣都司上奏，指出楚王府自行製作鐵牌一面，用於夜間出城門之用，表示「遇夜差人出城門公幹者，驗此開門」。楚府此舉不啻挑戰皇權，因此永樂帝為此特地修書告諭楚王朱楨：

---

[56] 明・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術數類第 60 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影印），卷一八，「楚分野」，頁 3。

[57] 例如清初顧炎武的《肇域志》和後來張廷玉主編的《明史》大抵都採取這種說法。見顧炎武，《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775；張廷玉等，《明史・地理志》卷四四，頁 1072。

[58] 明・不著撰者，《秘閣元龜政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編年類第 13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影印），卷八，總頁 507。

[59] 根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的記載：楚王府王宮周圍「甃以磚城」，城外再圍以紅牆，四方並有東體仁、南端禮、西遵儀、北廣智四門。（頁 16-18）

[60]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幅長江圖上，漢陽府城內亦有一塊長方形的空白區塊，與武昌府的大小相埒，同樣未做任何文字說明。很可能也屬於王府的宮室，不過，現存嘉靖以後的明代方志裡，皆無任何相關的記載。

[61]《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二〇一，頁 3016。

> 朕昔守北藩，地連邊塞，與胡虜相接，實為重鎮。護衛巡視王城及闌馬墻圓牌，皆朝廷所降。初無夜開城門鐵牌。況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賢弟賢明孝友，恪慎周詳，為親藩表率，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62]

書信中措辭雖然客氣，但語意堅定，成祖以自己過去鎮守北方的作法為例，強調即使貴為王府，也不得擅自違反「國家舊制」。儘管成祖不滿，也可能有意伺機削減楚王的軍事力量，但始終未下令撤減武昌三護衛。有些明代方志上記載楚王於永樂年間交出兩護衛。例如嘉靖《湖廣圖經志書》記載：「武昌護衛，在府南，洪武三年建，原封有三護衛。永樂初，楚王進還二護衛，止留此衛〔中護衛〕。」[63] 而萬曆《湖廣總志》(1591) 亦言：「諸藩建設不一，國初率設護衛，楚藩原設三衛，永樂中，奏辭二衛，今為衛一」。不論是「永樂初」或是「永樂中」，恐怕皆非實情。[64] 其實一直要到宣德五年 (1430)，楚府才將所轄制的武昌左、右兩護衛釋還給朝廷處置。

楚昭王朱楨第三子朱孟烷 (1395-1439) 於永樂二十二年 (1424) 襲封楚王。而當初在靖難之役降附明成祖，被封為平江伯的陳瑄 (1365-1433)，在宣德五年三月間派遣其子上京密奏，建言朝廷應對位居「東南大藩」的楚王府採取一定的節制措施。陳瑄在密奏中提及：

> 楚府自洪武初立國，有三護衛官軍及儀衛司旗校，俱無調遣。四、五十年之間，生齒繁育、糧餉充積。造船以千計；買馬以萬數。兵強國富，他藩莫及。而衛所之官，多結為姻親，枝連蔓引。小人乘時，或有異圖，實難制馭。

他提議明宣宗朱瞻基 (1398-1435) 可利用「今無事之時」，託言京師糧儲不充，要求重臣與湖廣三司「選其護衛精銳官軍給糧與船，令運至北京」，然後故意將

---

[62]《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四三，頁 682。

[63]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18。

[64] 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471-472。唯萬曆《湖廣總志》的記載亦有商榷之處，例如該書提及：「〔洪武〕三十二年五月庚寅，封王嫡子孟烷為楚世子，三十三年春正月戊辰，王薨，謚曰昭。長子孟婉嗣〔按：原文如此，或應作「烷」〕，是為莊王」。又言「文皇帝入靖內難，諸王守邊者多調內郡，恒被譴責。王（朱孟烷）辭護衛暨原賜西安名馬，深自貶抑。」按理說，洪武前後應止有三十一年，萬曆《湖廣總志》或因避諱「建文」年號，續用「洪武」紀年，此非特例，可以不論。然楚昭王朱楨實非逝世於「洪武三十三年」(1400)，而是永樂二十二年 (1424)，同時亦即明成祖朱棣駕崩之年，剛繼任楚王的朱孟烷恐怕也來不及向成祖辭去武昌護衛。

之「留使操備」，藉機「剪其羽翼、絕其邪謀」。[65]

儘管實錄上記載宣德皇帝向左右表示：「楚府向來無過」，並未採用陳瑄裁衛的建議，但當年正因建文帝即位後聽從齊泰 (?-1402) 與黃子澄 (1350-1402) 等人的建議著手削藩，才讓宣德皇帝的祖父——當時的燕王朱棣——以「靖難」勤王為名攫取政權。[66] 前鑑不遠，此時剛即位不久的宣德皇帝恐怕也不願重蹈覆轍。

無論如何，這份密奏的內容不久輾轉傳到楚王朱孟烷的耳中。就在宣德五年十一月，「深計遠慮」的朱孟烷於是上書請將其中兩護衛歸還朝廷。當時皇帝覽奏後向尚書張本 (?-1431) 表示：「楚王安分循禮，朕所素知，故厚待之。比屢有小人告訐，朕灼之其非，皆置不問，今何疑而請歸護衛乎？」張本為宣德皇帝分析奏書的意圖，他認為楚王此舉乃避免「曾參殺人」的流言，欲藉歸還護衛以明志。在張本「從之所以保全之」的建議下，宣德皇帝便派遣新建伯李玉齎書回覆楚王，表示楚王既「深存遠慮，欲杜後來讒邪之口，朕思之至再，故勉從所言」。從此便改「武昌中護衛」為「武昌護衛」，繼續留駐武昌外，「武昌左護衛」調往山東東昌，改為「東昌衛」；「武昌右護衛」調駐江蘇徐州，改為「徐州左衛」。[67]

這道遷改衛所的命令隨即付諸實行，武昌左、右二護衛在宣德六年之前便已調走。因此當年正月湖廣都司曾奏請朝廷：武昌衛轄下的左、中、前三千戶所，過去是因為城內地狹，只得於城外居住。而今武昌左、右二護衛既已調走，乞請朝廷允許將城中空下的屋舍，轉供武昌衛三千戶所居住，「以便守備」。這項請求隨後也獲得了中央的批准。[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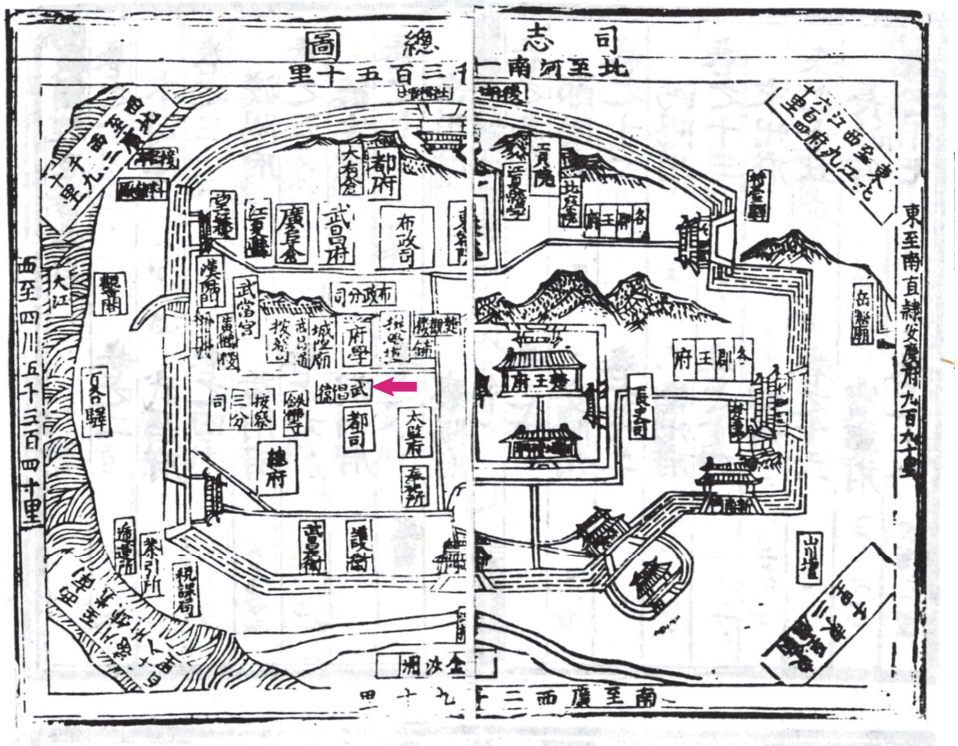
---

[65]《明實錄・宣宗實錄》卷六四，頁 1511-1512。

[66] 關於明初王府分封與削藩的歷史發展，參見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第二章，頁 34-85。

[67]《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七二，頁 1683-1684。儘管楚府僅留一護衛，但總數仍高達五千二百人。根據宣德六年三月丁丑楚王孟烷奏：舊例護衛軍士八分下屯、二分守城，今止存一護衛。除老疾亡故、女戶、及諸郡王使用外，僅有一千二百人供給楚府，因此「乞免屯田」。不過戶部表示：楚王雖僅剩一護衛，但仍有官軍五千二百人，故宜仍舊下屯。宣德皇帝裁示：「軍士豈應坐食？令使用外，仍以一半下屯」。見《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七七，頁 1793。

[68]《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七五，頁 1738。



圖九：武昌府司志總圖（《湖廣圖經志書》〔1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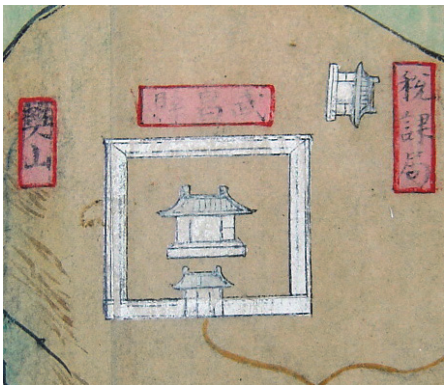
長江圖上在武昌府城內標示的仍是洪武年間開始駐紮於武昌的中、左、右三護衛，可見製圖當時三護衛尚未調遷。由此我們可以確定：這幅長江圖應當是在宣德五年之前所繪。如果僅從武昌衛所建置的更名與調遷來看，那這幅長江圖的製作年代的上限應該是「武昌護衛」改名為「中護衛」的洪武二十三年 (1390)，下限則是武昌左、右兩護衛改調別處的宣德五年 (1430)。

五・制度史的線索：城牆、城門、城垛與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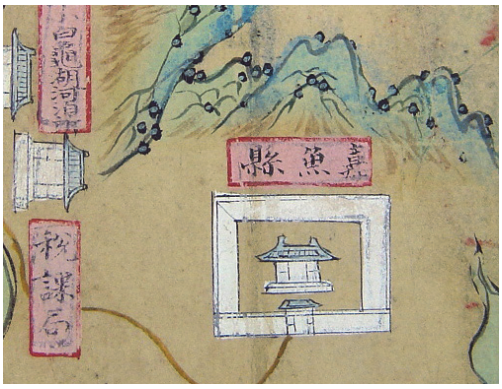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建城築牆，當然並非僅作為防禦之用。城牆宣示權力文化的重心所在，同時也展現行政的位階層級。[69] 在這幅長江圖的殘卷中，江水流經的府治或

[69] 參見 Edward L. Farmer, “The Hierarchy of Ming Walls,” in *City Walls: the Urban Enceinte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61-487.

縣治總共有六處，其中隸屬漢陽府的嘉魚縣與隸屬武昌府的武昌縣都並未圍有城牆（參見圖一〇、圖一一），在圖上僅標示出縣治衙署的位置。



圖一〇：長江圖武昌縣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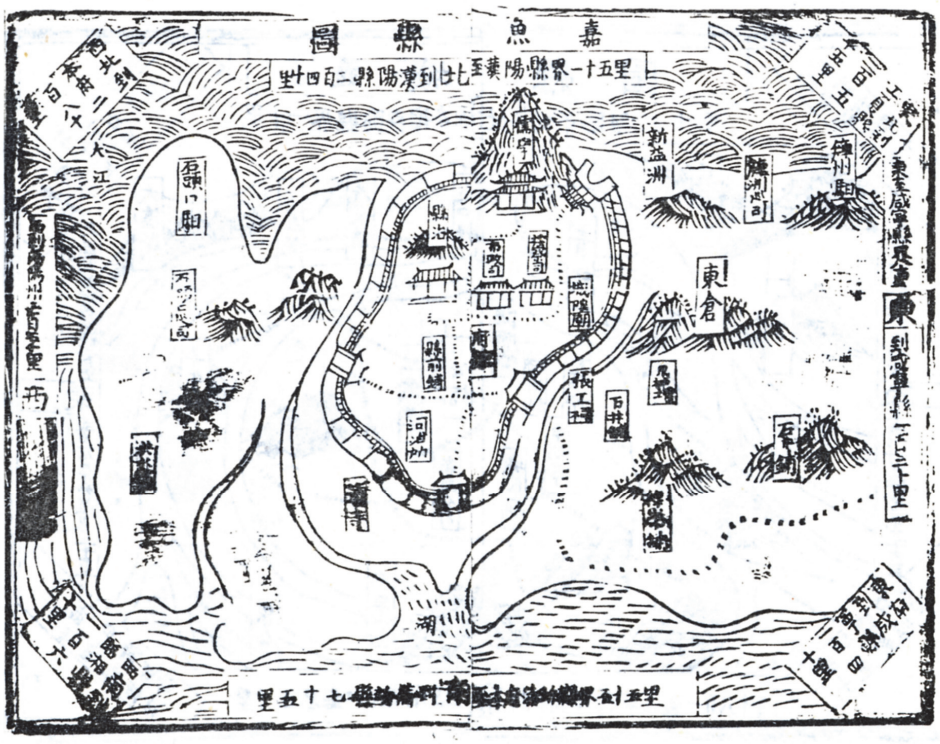
圖一一：長江圖嘉魚縣部分

嘉魚縣衙創建於「洪武甲辰 (1364)」，[70] 大抵因為所在地有「東南阻山，西北距江」的天然屏障，一直未築城池，英宗正統年間也不過增築一道「土垣木柵」。直到正德時期「羣盜大起」，知縣陸槐才在沙洋城故址拓築女牆，並在牆上覆瓦。[71] 值得留意的是：長江圖上位於嘉魚縣治西方的「稅課局」，在正統二年 (1437) 遭到裁撤（參見圖一二）。[72]

[70] 萬曆《湖廣總志》(1591) 卷一三，頁 503。

[71] 正德年間的城牆週迴二百雉，高一丈二尺，厚六尺。有四座門：望東、南薰、西戍、北鑰。參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二，頁 39；萬曆《湖廣總志》(1591) 卷一四，頁 529；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雍正《湖廣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史部第 531-534 冊），卷一五，頁 2-3；另見清・鍾傳益修，清・俞焜纂，同治《重修嘉魚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0 冊，據清同治五年〔1865〕刻本影印），卷一，頁 30-31。

[72] 明・莫震修，明・孫允恭纂，正統《嘉魚縣志》（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據明正統十四年〔1449〕刊本），頁 22。



圖一二：嘉魚縣城（《嘉魚縣志》〔1449〕）

武昌縣的衙署同樣是在「甲辰年」(1364) 開設。[73] 根據乾隆《武昌縣志》(1763) 記載，該縣的衙署在洪武初年由知縣戚元禮創建，有「大門一座」和「聽政堂一座」。[74] 對照長江圖上所標示的衙署圖樣，正是由「聽政堂」與「大門」所構成。附帶一提：乾隆《武昌縣志》的編者在提及衙署時，特別有感而發地闡述衙署的功能：

> 衙署，非傳舍也，以通一邑之隱，則必使重門洞開，無所壅蔽；以作一邑之庇，則不啻廣廈萬間，無或暴露；以杜一邑之奔競，則當掃清堂奧，無使塵囂。故閉閣思過，以是為齋居之地；晝諾坐嘯，以是為宴息之所處。

[73]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二，頁 45。萬曆《湖廣總志》(1591) 亦略載後來修葺的情形：武昌縣署，洪武甲辰知縣戚元禮創建，三年知縣孟吉謝增建，嘉靖中知縣許諶謙相繼增修，見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三，頁 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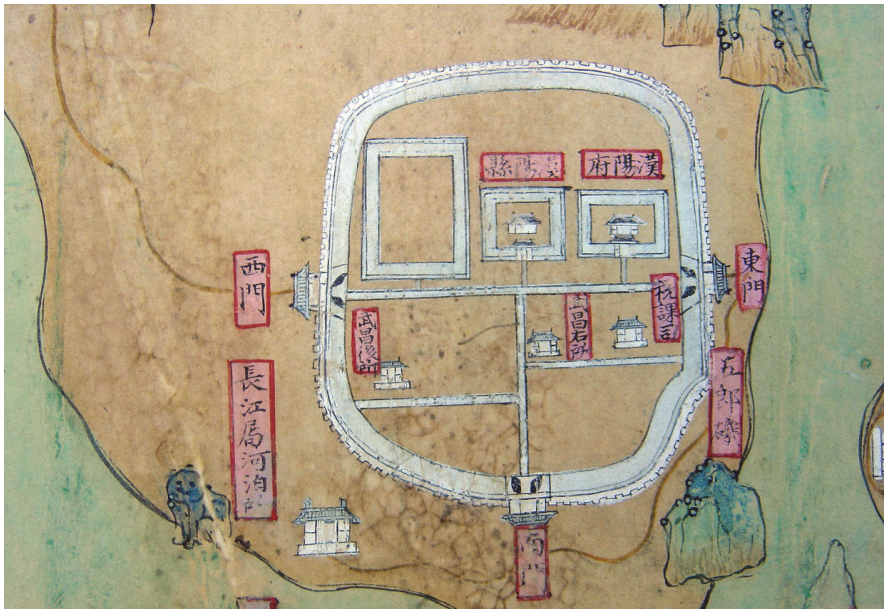
[74] 清・邵遐齡修，清・談有典纂，乾隆《武昌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3 冊，據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影印），頁 37。

這番官箴式的析論，以為衙署種種設置與管理，無一不與州縣官員如何恪盡職守有密切關連。

其實武昌縣在隋大業元年 (605) 時曾經築過土城，唐代一度廢毀，宋嘉祐年間復設城門。[75] 明代天順年間，先是由知縣楊子奎在各個方位創建巡警樓，到了嘉靖年間，知縣張鐸開始修建衙城，目的是保衛倉庫。直到萬曆初年，由於「居民輻湊、盜賊不時竊擾」，知縣李有朋於是決定均派夫役就山鑿石，建築城牆，並設立四座城門。[76]

除了嘉魚縣和武昌縣之外，長江圖上其餘四處府、州、縣治所在位置都圍有城牆，圖上也明確標示城門的位置與名稱。在武昌府城與蘄州城的周遭，甚至繪有環繞城牆四周的隍池。

在長江圖上，漢陽府漢陽縣僅有三座城門，分別就其方位稱做「東門」、「南門」與「西門」，這可能是早期漢陽城城門的稱謂。（參見圖一三）我們試將該城城門於明清時期的名稱演變列表如下：



圖一三：長江圖漢陽府漢陽縣

[75]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二，頁 39；萬曆《湖廣總志》(1591) 卷一四，頁 529。四座城門：東曰鳴鳳，西曰文昌，南曰朝都，北曰鎮江。

[76] 乾隆《武昌縣志》，頁 36-37。四座城門分別取名：東曰通淮，南曰文昌，西曰望楚，北曰朝京。

表七之一：長江圖上城門變遷——漢陽府漢陽縣

	長江圖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漢陽府志》(1546)	《湖廣總志》(1591)	《漢陽府志》(1747)	《漢陽縣志》(1868)
東	東門	朝宗	朝宗	朝宗	朝宗	朝宗
南	南門	南紀	南紀	南紀	南紀	南紀
西	西門	鳳山	鳳山	鳳山	鳳山（白雲樓）	鳳山
北	無		朝元（旋塞）			朝元（塞）

根據嘉靖《漢陽府志》的記載，當時的漢陽城東南緊臨大江，西北橫跨鳳棲山，周圍七百五十六丈。四座城門中，東為朝宗，南為南紀，西為鳳山，北為朝元，但朝元門在該府志編纂時已經填塞封閉。[77] 對照長江圖上的漢陽城，並未畫出北門，可見當時或已填封，或尚未開通。

與漢陽府比較起來，在對岸的武昌府，城池的規格明顯宏偉許多。武昌建城可溯自三國，允為古代名城。明代的武昌城則是在洪武四年 (1371)，江夏侯周德興就舊城的基址增築而成。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甚至詳細列出整座城池相關措施的尺寸數據：

> 城周圍三千九十八丈，城垣東南高一丈，闊二丈五尺，西北高三丈九尺，闊九尺。濠塹周圍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深一丈九尺，闊二丈六尺。垛眼四千一百六十八箇，城鋪九十三座，城樓一十三座。[78]

長江圖上雖然沒有鉅細靡遺地將城鋪與城樓一一標出，但護城的濠塹與城牆上的垛堞卻清晰可辨（參見圖八）。至於長江圖上所標示的九座城門，名稱與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的記載基本相符，僅有「北門」改作「草埠門」。嘉靖十四年 (1535)，都御史顧璘 (1476-1545) 再次整修武昌九門，並一一重新命名。[79] 武昌府城城門的變遷可簡單列表如下：

---

[77] 嘉靖《漢陽府志》卷三，頁 17。

[78]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15。不過此數據與萬曆《湖廣總志》(1591) 的記載有些出入：周二十里有畸，計二千九十八丈，東南高二丈一尺，西北高三丈九尺，池周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深一丈九尺，闊二丈六尺，池外餘十丈許。（頁 529）

[79] 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529。

表七之二：長江圖上城門變遷——武昌府江夏縣

	長江圖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嘉靖十四年 (1535)，都御史顧璘重修改名	《湖廣武昌府志》(1687)
東	小東門	小東	忠孝	忠孝
	大東門	大東	賓陽	賓陽
南	新南門	新南	中和	中和
	保安門	保安	保安	保安
	□□門	望山	望山	望山
西	竹簰門	竹簰	文昌	文昌
	平湖門	平湖	平湖	平湖
	漢陽門	漢陽	漢陽	漢陽
北	北門	草埠	武勝	武勝

離開武昌府的江夏縣，按照長江圖順流而下，就會看到黃州府黃岡縣的城池。黃州府治創建於洪武元年。[80] 其中有條線索可供我們考定這幅長江圖的年代：黃州府的稅課司是洪武初年所建，該司在長江圖上是位於「易字門」外，但在弘治《黃州府志》(1500) 編纂時，稅課司已經改至府城南的「清源門」外。[81] 不過最遲在萬曆《湖廣總志》(1591) 刊刻時已遭裁廢。[82]

黃州府城初建於「洪武甲辰年 (1364)」，隨後在洪武十七年與永樂六年 (1408) 相繼進行修繕的工程，修建後的規模，包括雉堞二千一百一十九，四座城門分別是：東清淮，南一字，西清源，北漢川。[83] 與長江圖上所描繪黃州府城的情形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長江圖上清楚地勾勒出城牆上的雉堞（即垛口；參見圖一四）。當然，不一定所有的城牆上都會修建雉堞，例如長江圖上的武昌縣並未建造城牆，雖然曾經在萬曆初年建城設門，但一直要到崇禎末年，由於當時防備的需求，知縣鄒逢吉才「增築沿城窩鋪於堞間，以資守禦」。[8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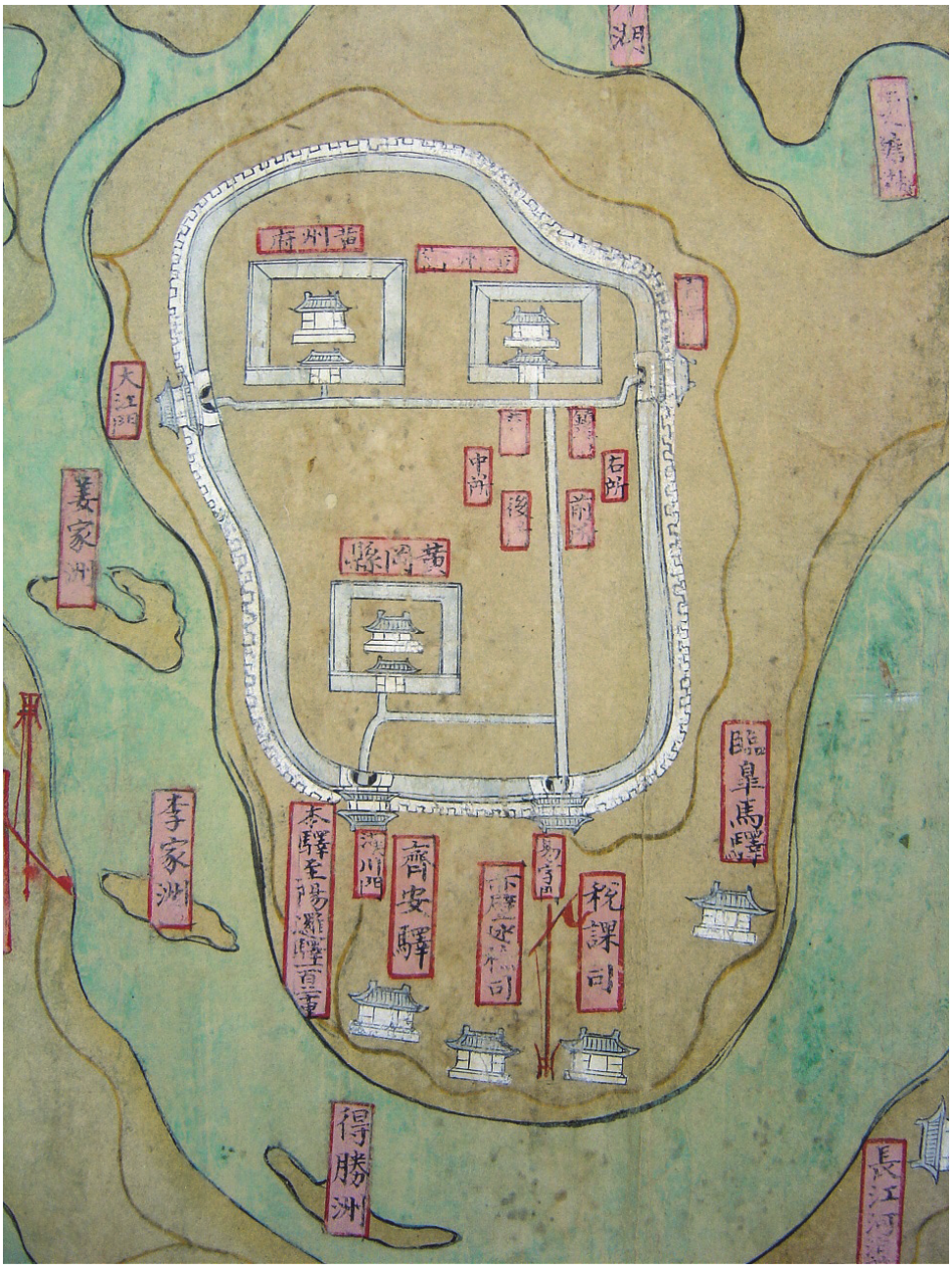
[80]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4；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505。

[81]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63；亦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4。

[82] 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505。

[83]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21；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1；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530；萬曆《黃岡縣志》(1608) 卷二，頁 1-2。

[84] 乾隆《武昌縣志》，頁 37。



圖一四：長江圖黃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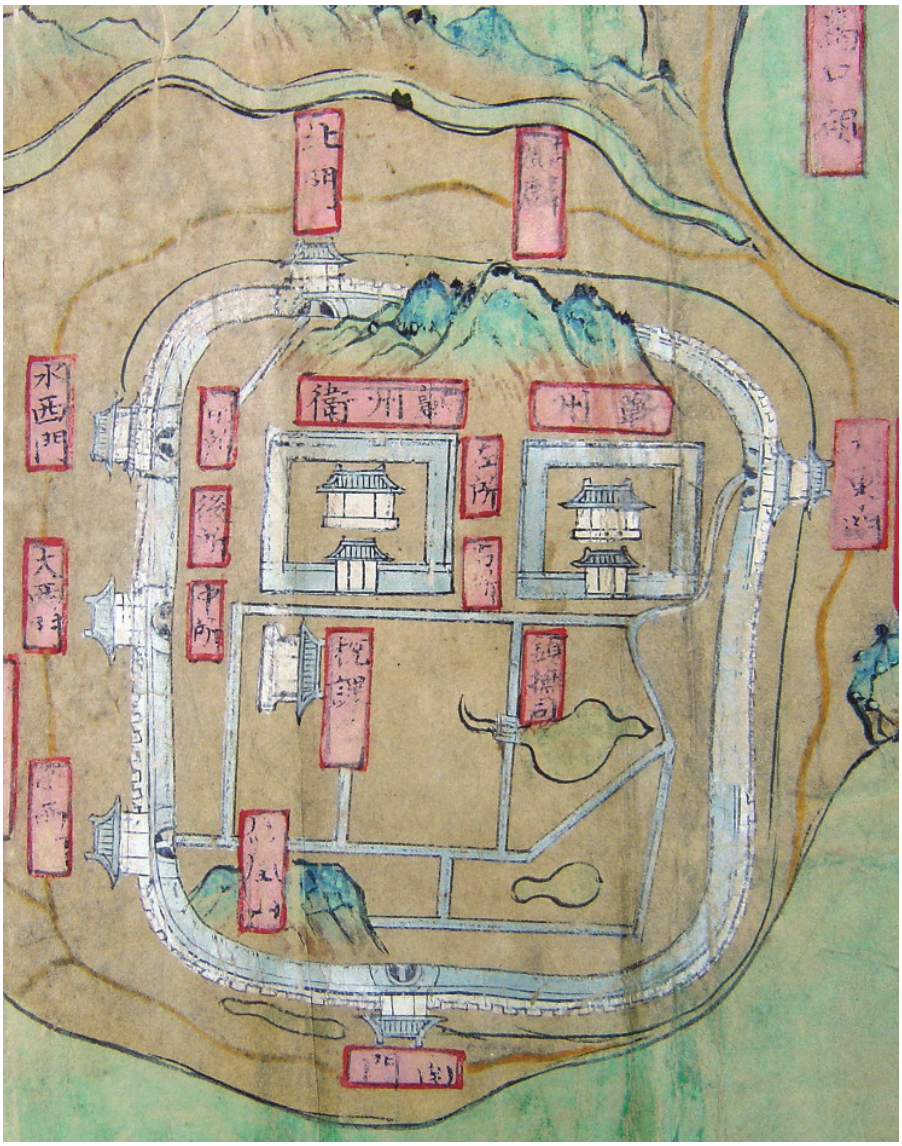
表七之三：長江圖上城門變遷——黃州府黃岡縣

	長江圖	《黃州府志》(1500)	《湖廣圖經志書》(1522)	《湖廣總志》(1591)
東	青漢門	清淮	清淮	清淮
南	易字門	一字	一字	一字
	漢川門	清源	清源	清源
西	大江門	漢川	漢川	漢川

若離開黃州府黃岡縣，從齊安驛順江而下六十里，會經過蘭溪驛。再一百二十里就會抵達蘄陽驛，也就是這幅殘圖上最後一座城池——黃州府蘄州。（參見圖一五）

表七之四：長江圖上城門變遷——黃州府蘄州

	長江圖	《黃州府志》(1500)「蘄州圖」	《黃州府志》(1500)文字記載	《蘄州志》(1536)	《蘄州志》(1664)「州境圖」	《蘄州志》(1664)文字記載
東	大東門	朝陽	朝陽	朝陽	賓陽	賓陽
南	南門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西南	□〔小〕西門	清澄※	澄清※	澄清	聚奎	聚奎
西中	大西門	旬宣	旬宣	旬宣	澄清	澄清
西北	水西門	澄清※	善城※	善城	觀瀾	觀瀾
北	北門	雄武	雄武	雄武	拱辰※	武襄※



圖一五：長江圖黃州府蘄州部分

蘄州，明朝肇建之初原在此處設府，洪武九年改府為州。[85] 長江圖上的蘄州衛，原建於洪武元年，位於麒麟山之陽。正統八年 (1443)，原駐防於建昌的荊王朱瞻堈上奏表示其王府所在地「僻處山隅，時有瘴癘」，擬請改遷他處。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原本允諾荊王遷往撫州，不久改命長沙，隨後又以長沙地

[85] 萬曆《湖廣總志》(1591)，頁 506。

勢卑濕，終才選定蘄州作為駐點新址，並以原蘄州衛的所在地改建為王府。荊王於正統十年正式遷居於此。[86] 原本蘄州衛則搬遷至城西的旬宣門內，駐防於原廣儲倉的舊址。[87] 不僅蘄州衛的位置有所改變，本屬州治管轄的稅課局，在正統年間也從城內遷至遷善門外，並改隸荊王府。[88] 這幅長江圖在繪製之際，顯然荊王府尚未遷至蘄州，因此稅課局仍位於城內。更重要的是：長江圖上蘄州城的六座城門，僅就東南西北的方位命名，易於辨識指認或是主要考量，恐怕要到後來才以雅馴的名號一一取代。

對研判長江圖製作年代另一條重要的線索，攸關蘄州建城的歷史。根據嘉靖《蘄州志》(1536)「城池」一節所載，蘄州作為軍事重鎮，歷來都有修葺城牆的紀錄：洪武六年的守禦許勝；永樂六年的指揮胡善；天順七年的指揮李廣、胡宣；成化二十二年的指揮李恭、田禛；以及正德十四年的指揮王欽、舒泰等，先後都有修繕之舉。其中在永樂六年 (1408) 的工程中，指揮胡善在城牆上增築腰墻垛口，共計城垛三千一百六十五箇。[89] 而在這幅長江圖上，即可清楚辨識出垛口的形狀。由此當可再次確認：這幅長江圖製作時間應不會早於永樂六年。

六・自然變遷與城鎮發展：長江圖上的漢水與漢口

根據前面各種制度史的線索，我們大致可以將這幅長江圖的繪製年代，縮限在永樂六年至宣德五年之間。換言之，這幅反映明代早期長江地理實況的「衛所城池水陸里程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釐清關於長江流域在明代早期一些聚訟紛紜的歷史課題，甚至可以校正傳統官志如《明史》的記載。

首先是漢水的改道問題。

漢水的水患本是地理的因緣、歷史的宿命。這片被視為古代雲夢大澤的遺址，[90] 水文變化極大，江、湖之間常隨季節而聚分離合。當黃福在永樂四年乘船

---

[86]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26；嘉靖《蘄州志》(1536)，頁 544。

[87]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68；嘉靖《蘄州志》(1536)，頁 552。

[88] 弘治《黃州府志》(1500)，頁 66；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頁 335；嘉靖《蘄州志》(1536)，頁 546。此外，原本位於雄武門外的遞運所，也在成化四年，知州何堯中奏准遷於州北四里。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頁 335。

[89] 嘉靖《蘄州志》(1536)，頁 539-540。

[90] 現代學者透過考證歷代史料，對所謂「雲夢大澤」的存在加以質疑：其實歷史上從無有一個橫跨長江南北、囊括江漢平原的「大雲夢澤」存在過，參見石泉、蔡述明，《古雲夢澤研究》（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經過這段流域時，便發現「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多與江合」。他所搭乘的船隻幾乎是「由湖而行」，幸好水順風閒，並無洶湧之虞。因此黃福倒也能在「帆拂蘆荻花，棹穿菱芡實」中自得其樂。[91] 從黃福此行的親身經歷，也可印證前面論及長江圖上各驛站間里程和官方記載（如《寰宇通衢》）略有出入，或許並非筆誤所致，而是在不同時間進行實地測量，水道有所變化的緣故。

歷史上長江水域最重要的水道變化，莫過於與漢水匯流的路徑與出口。按照《明史・地理志》的描述：

> 漢水自漢川縣流入，舊逕〔大別山〕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於縣西郭師口之上決，而東從山北注於大江，即今之漢口也。有漢口巡檢司。[92]

言下之意，成化年間漢水河床改道的結果，便是改變了漢水匯注長江的出口：從大別山的山南改成山北。這段記載恐怕與實情有所出入，並且有誤導之嫌。[93] 細按其文意脈絡，似乎就連漢口巡檢司的建置，也是在成化漢水改道之後，出現了新的「漢口」，因應需要而開設。

漢水改道，牽涉到的不僅是自然地貌的消長變化，更攸關人文地理的聚落發展。幾乎所有關於漢口發展的研究，都將漢口鎮的形成推源於成化年間漢水的改道。不少研究漢口歷史的學者更進一步推斷：漢口巡檢司最早出現於嘉靖年間。[94] 羅威廉教授 (William T. Rowe) 在其研究漢口商業與社會的專著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一書中，即綜合相關史料，認為在十四世紀時，漢水尚從漢陽城南方注入長江；迨至成化年間漢水改道之後，才從漢陽城的正北處與長江相匯。[95]

---

[91] 明・黃福，《黃忠宣公文集》卷一，〈奉使安南水程日記〉，頁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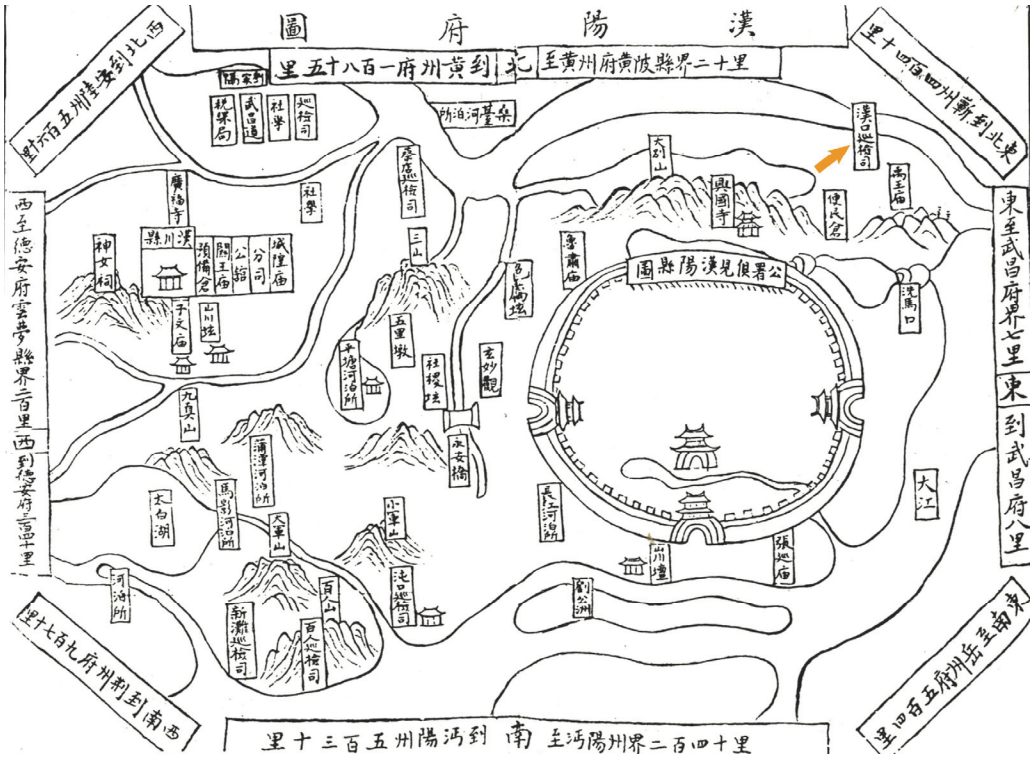
[92] 清・張廷玉等，《明史・地理志》卷四四，頁 1073。

[93] 石泉在檢討歷代學者關於漢水東流至大別山而轉南入江的解釋中，即曾質疑《明史・地理志》的這段記載。見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氏著，《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頁 383-384。

[94] 例如皮明庥等編，《漢口五百年》（武漢：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6），頁 14。湯黎，《人口、空間與漢口的城市發展 (1460-193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一書亦指出「明嘉靖年間，漢陽府設置漢口巡檢司管理漢口行政和商務，司署駐南岸崇信坊，漢口鎮已具雛形」（頁 36），然並未列舉任何佐證史料。有些殆屬通論性的作品，甚至信筆寫道：「到了明朝晚期，才由漢陽在漢口設立巡檢司。」見方方，《漢口的滄桑往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 7。

[95]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7-28. 羅氏並表示自己檢索到最早的改道年代是一四九七年 (p. 353 n. 5)。然筆者覆核羅氏所根據的乾隆《漢陽府志》的卷數與頁碼，該卷介

依照傳統「山南水北曰陽」的地名命取慣例，[96] 古代的漢水的確可能一度是從漢陽的南方注入長江。但在明清時期，漢水的出口之處，早已在漢陽城的北方。現存最早明代的漢陽府圖，應是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參見圖一六）。圖上明確標示漢水自漢陽北部入江，匯注之處亦設有漢口巡檢司。不過，江漢在漢陽之北匯流的時間，以及漢口發展的歷史，恐怕都再可追溯到嘉靖之前。



圖一六：漢陽府圖（《湖廣圖經志書》〔1522〕）

紹漢陽縣的城郭坊鎮，確實有記論及「漢鎮形勢」，但並無任何提及一四九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的改道記載。見清・陶士偰修，清・劉湘煃纂，乾隆《漢陽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1 冊，據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影印），卷一二，頁 3。

[96] 最典型的例子是咸陽。鮑彪本《戰國策》曾引《關中記》說明咸陽得名的緣由：「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見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三一，頁 1139-1140。

其實，漢水在成化年間的改道，並非更改注入長江的出口處。比對《明史・地理志》的籠統記載，嘉靖《漢陽府志》的〈方域志〉中對這段水道變遷的歷史，反而有比較具體的描寫：

> 襄河，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繯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今魚利畧存，舟楫已不達矣。呼襄河者，水自襄陽來也。[97]

嘉靖《漢陽府志》的成書與成化年間的改道相距不遠，編者這段敘述即使並非親身歷證，至少是當地口傳耳聞的共識。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是在漢陽境內從排沙口到郭師口這一段的水道截彎取直，類似於河川中下游牛軛湖 (ox-bow lakes) 的形成過程。從「然後下漢口」一句的文意推敲，顯然此改道與郭師口下游漢水入江的河段並無關連。換言之，成化年間漢水雖然發生改道，但漢水注入長江的出口位置，並未產生劇烈且持久性的改變。[98]

在顧炎武廣參博采明朝地方誌書纂輯而成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稿本）裡，特別留意湖廣一地的水利隄防，其中〈漢陽縣隄考畧〉如此分析：

> 按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舊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鵞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逕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瀉，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屯口、刀環等湖易以氾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沒之患，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堤防。[99]

---

[97] 嘉靖《漢陽府志・方域志》卷二，頁 251。

[98] 關於明清時期漢水流域的地貌改變，可參考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五章。不過其對嘉靖《漢陽府志》的相關記載，亦解釋成化年間的改道為「主泓道之南移」（頁 465，註 2），並未論及是否影響漢水入江口。

[99]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95-597 冊，據四部叢刊影印稿本影印），第廿五冊，「湖廣下」，頁 15。該段文字亦收於清・劉嗣孔修，清・劉湘煃纂，乾隆《漢陽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36 冊，據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影印），卷七，頁 16-17。惟並未註明出處，或提及〈漢陽縣隄考畧〉，結尾作「故府治可不設隄防」。

劃有底線的段落，乃關於漢水古道與成化初年改道的論述，實與前引嘉靖《漢陽府志・方域志》的內容如出一轍，兩者應有先後沿承的關係。而此篇〈漢陽縣隄考畧〉可能即為後人經常徵引的〈隄防考〉。[100]〈漢陽縣隄考畧〉亦僅指證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後「古道遂淤」，並未提及注江改口一節。不過該文觀察到：漢水雖然從漢口注入長江，但因長江濤水洶湧，以致漢水無法順利瀉流注入長江，挫阻於漢口的漢水不得已「逆折而上」，形成迴流倒灌，導致漢水下游的湖泊漫溢氾濫。影響所及，漢陽府在春夏水漲時期便常受水患浸沒之苦。

如果前面我們逐一勘對圖上各項官方建置的興革時間，藉以斷定製圖年代無誤，那麼這幅繪製於永樂、宣德年間的長江圖，可能是現存地圖中，最早對江漢流域水文進行細緻而具象的狀述。並且其所圖示的漢水流向與路徑，當是成化年間改道之前的「古道」。至於各主、支流的匯注分合、湖泊的叢錯分佈，對研究明朝中期以前江漢流域水文變遷，極具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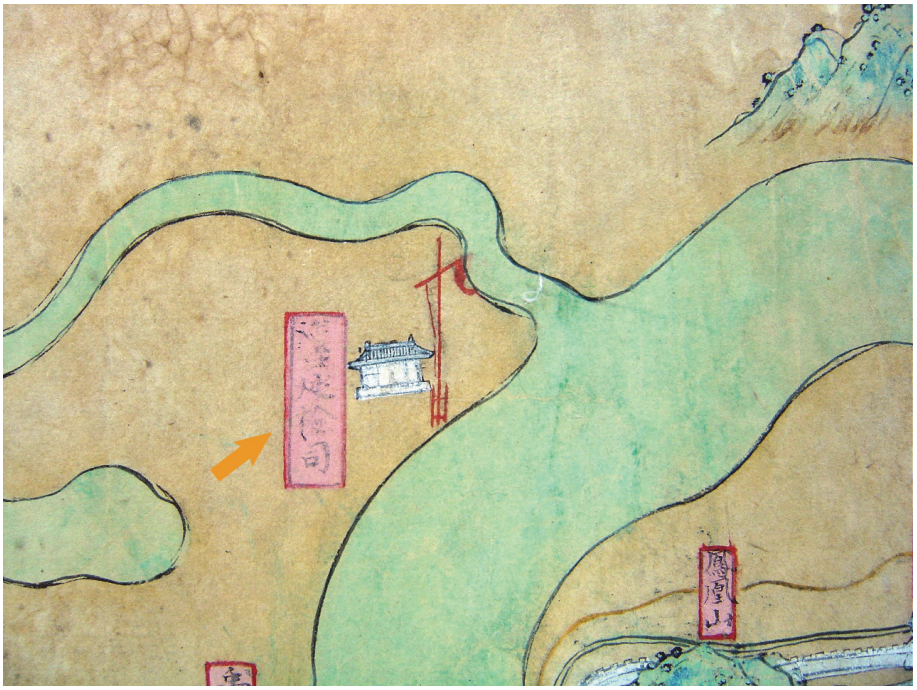
根據這幅長江圖的描繪，早在成化以前，不僅漢水已經從大別山的北岸注入大江，而且漢口巡檢司也早已設立。經制漢口的重要性，恐怕甚至在這幅長江圖製作之前，便已受到官方的高度關注。（參見圖一七）

圖一七：長江圖漢水部分

[100] 例如范鍇《漢口叢談》所援引〈隄防考〉的一段，從一開始至「俗乎曰襄河，以上流自襄陽來也」。見氏著，《漢口叢談》（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華中地方湖北省第 347 號，據清道光二年〔1822〕刊本影印），卷五，頁 8-9。

關於漢口發展的歷史，首推清中葉浙江烏程人范鍇 (1764-?) 的《漢口叢談》，該書成於道光初年，以筆記體裁多方徵引史料。根據范鍇的研判：漢口一開始不過是一「蘆洲」，要等到明成化初年「水通前道，故河遂淤」，漢口才有興起的契機。[101]

在這幅長江圖上，漢水匯入長江的附近，即已清楚標明了「漢口巡檢司」的所在位置。顯見漢口巡檢司最晚在宣德五年之前即已設立。更重要的是：在長江圖製作之時，漢水已經是在漢陽府城的北方注入大江。（見圖一八）若按照前引明太祖昭示其設置巡檢司的用意：巡檢司乃設置於關津要道，防範姦偽滋生，好讓「士民樂業，商旅無艱」，可見就在這漢口巡檢司設置的左近處，應為商旅交通孔道，並可能已形成一定的聚落群居；換言之，漢口恐怕早在明初就已具發展的雛形，而這幅長江圖不啻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明。



圖一八：長江圖漢口巡檢司

[101] 清・范鍇，《漢口叢談》卷一，頁 35。

關於漢口鎮早期發展最重要的一份歷史文件，就是在嘉靖二十五年 (1546) 所立的〈漢口地稞〔課〕碑記〉，[102] 碑文提及當時江夏縣民蕭廷機的始祖蕭一承佃漢陽縣三淪河泊所十八埚蚊子馬場湖南側的地土，「西至郭師口，東至大江」。天順年間民人張添爵等父祖在彼築基蓋房，每年認蕭一課銀三分。成化年間被武昌護衛軍孫廣、邢璉投獻江夏王府，每年上岸基地一間，收鵝一隻；下岸一間，收鷄一隻。後來弘治十年時，江夏王府想要加徵課銀，各民不肯認納，於是孫廣、邢璉轉投獻楚府，每年上岸一間，徵銀三錢六分；下岸一間，徵銀一錢八分。當地居民「懼府勢力，不敢抗違」，只好開始繳納課銀。而根據嘉靖四年 (1525) 楚王府因徵銀所需進行的丈量資料，上岸張添爵等六百三十戶，共房基一千零三十五間，下岸徐文高等六百五十一戶，共計地一千零九十一間；李勤等七十三戶新築地基，二百八十一間；丁太等二十戶，偏僻地八十二間；王彥澄、李仕英等一十一戶，開墾園地一十一段。可見嘉靖四年這個地方已經是生齒日繁，高達近一千三百八十五戶的居民在此生業。

過去研究漢口發展的學者，殆皆以這份文件來論斷漢口鎮的萌蘖，並推至天順年間 (1457-1465) 居民開始在此安頓生活，築基蓋房，從而聚落。不過，若仔細檢讀萬曆《漢陽府志》的相關資料，編纂者秦聚奎（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在討論官府課稅造成居民不堪負荷而紛紛流失時，曾特別引用王光裕的建言：

> 開國即建漢陽郡邑，即經制漢口鎮，上下交相承恤，以圖永久。官家所取，歲有常額，額有常直，軫念民瘼者須倍加撫愛，庶乎澤不竭而續可漁。不然，民貧且散，則無漢口，無漢口，則無漢邑，而郡且不可為郡矣。故培養一鎮而無所利賴者大，胡可傳舍視之？[103]

王光裕這段立論的主旨，本在期許地方官府體恤民情，切勿竭澤而漁。不過從其前言語意推敲，明朝開國之初，即著手經營漢陽府，與此同時，漢口鎮便已在漢陽府的經制下逐步發展。作為呼籲官府的建言，王光裕這段關於明初即建置漢陽、經制漢口的敘事，當非嚮壁虛造，應該具有一定的共識基礎。以長江圖為證，漢口巡檢司的設置，正與王光裕的「經制」之說不謀而合，足以佐證漢口鎮形成的時間當可推移到明代開國之初。

---

[102] 明・秦聚奎修，萬曆《漢陽府志》（東京：舊上野圖書館，國際マイクロ寫真工業社，1989，據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刊本攝製），卷六，〈漢口地稞碑記〉，頁 96-99。

[103] 萬曆《漢陽府志》卷二，頁 16。

這篇〈漢口地稞碑記〉在乾隆《漢陽府志》(1747) 中被改成〈漢口北課舊碑記〉，此應非續志者編排誤植所致，而是考量到編修當時地理位置的改變，藉此標明該碑記所提及的所在，是位於乾隆年間漢口的北方。[104] 因此編者在碑記後面特別補充：碑文中提及江夏縣民蕭廷機在前朝所承租的基地，「嗣後僅存後湖柴草地土」，且在順治十八年時「被販馬諸商縱放，踐食錢糧」，因此向官府控告在案。

這座位於漢口北方的「後湖」，又名「瀟湘湖」。乾隆《漢陽府志》特別標明這瀟湘湖的所在地，即是過去記載中所謂的「漢水古道」：

> 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久淤。夏秋水漲，名瀟湘湖，春涸草生，名黃花地。[105]

這片低窪地區的自然型態隨季節變化，夏秋聚水成湖，冬春則水涸草生。府志編者並附錄一首七言絕句〈瀟湘湖〉，傳說是明太祖朱元璋御駕當地的題詩：

> 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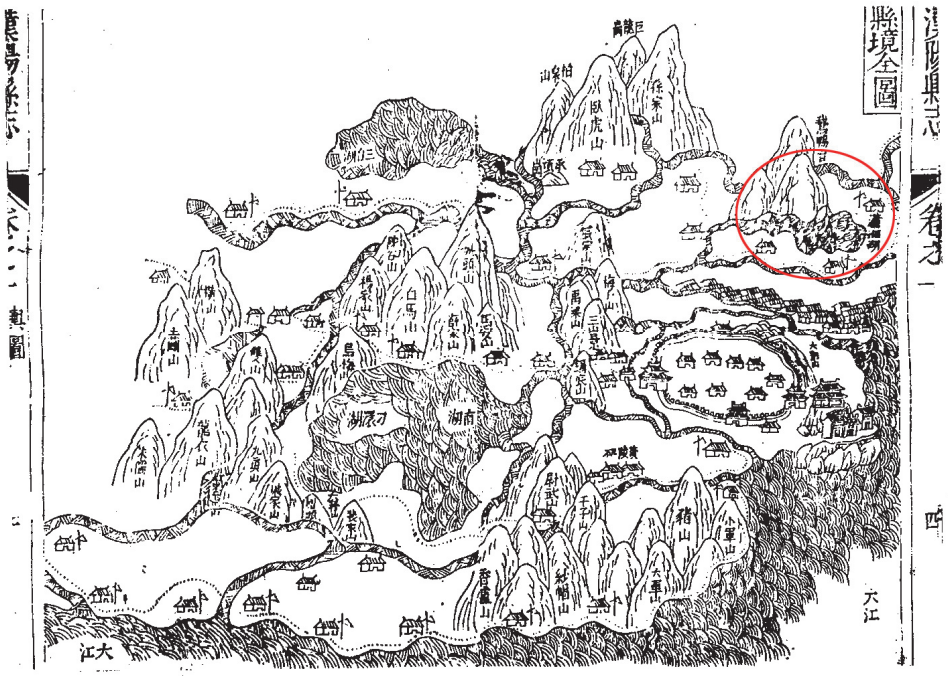
編者更煞有介事地考證：朱元璋殪斃陳友諒 (1320-1363) 於鄱陽湖，追至武昌而返。後一年又射討陳友諒之子陳理，於是駐兵漢陽，並修建城郭。陳理投降後，朱元璋「振旅足跡，未嘗越江漢以南」。編者因此推論這座位於漢口後方的瀟湘湖，「適與太祖用兵之地相符，勒馬賦詩，或當在此。姑耳存之」。[106] 在乾隆《漢陽縣志》(1748) 的縣境圖裡也清楚地標示出這座瀟湘湖的位置。（參見圖一九）

---

[104]〈漢口北課舊碑記〉見於乾隆《漢陽府志》卷一二，頁 3-6。此兩篇碑記在標題上的差異，也有可能是編纂者在傳抄前志碑文時，因刊本字跡漫渙致使辨識出現舛誤，如將「地」認「北」，只不過誤「稞」為「舊」的可能性不高。而今存萬曆《漢陽府志》的版本裡，〈漢口地稞碑記〉的標題字跡清晰可辨。

[105] 乾隆《漢陽府志》卷八，頁 86。

[106] 乾隆《漢陽府志》卷八，頁 86。



圖一九：漢陽縣境全圖（《漢陽縣志》〔1748〕）。瀟湘湖位於右上角

晚清著名今文學家魏源 (1794-1857) 儘管深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切戒學者避免以今度古的謬誤：「凡執今日之水道者，不可以治《禹貢》」。不過，在其研究歷史地理的《禹貢說》裡，魏源援引了〈隄防考〉所論並進行推論：

> 〈隄防考〉云：廢襄河，亦名瀟湘河。離漢口北岸十里許，本古漢水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支，一支爲今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如織。一支爲其經流，夏漲時，舟至灄口，即由此湖達瀟湘湖，應馬湖、牛湖而行。[107]

[107] 見清・魏源，《禹貢說》（收入《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一編禹貢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第 7 冊，據清同治六年方氏碧玲瓏館刻本影印），卷下，頁 28。另在其《書古微》中的案語略有出入：「案隄防考云：瀟湘河離漢口北岸十里，本漢水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偶至。惟北河乃其經流，夏漲時舟至後湖，達瀟湘河，應馬河以入江。」見魏源，《書古微》（收入《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二編尚書禹貢篇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第 6 冊，據清光緒四年刻本影印），卷五，頁 40；又見魏源，《古微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22 冊，據清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本影印），卷下，頁 25。

〈隄防考〉的完整本文與原始出處，今已不可得見，但就現存資料比對，魏源的案語顯然有誤引〈隄防考〉之虞。范鍇《漢口叢談》亦引用過〈隄防考〉一文，但內容不出前引萬曆《漢陽府志》收錄的〈漢陽縣隄考畧〉。〈隄防考〉確曾提及位於漢口北岸十里處有久淤的「漢水古道」，但隻字未提「瀟湘河」。至於「久淤」二字之後描述舊河道一分為二的情形，亦不是〈隄防考〉的本論。至於魏源所引的〈隄防考〉，其實是乾隆《漢陽府志》將「瀟湘湖」與漢水古道聯繫起來的記載。[108]

如果說這座瀟湘湖真是朱元璋勒馬賦詩之處，官方繪製的長江圖決不可能隱諱省略。但是這幅明白標示各大小湖泊的長江圖上，卻未見「瀟湘湖」的蹤影，在相關位置上，僅有三淪湖以及三淪河泊所的標示。根據清代穆彰阿 (1782-1856) 於嘉慶年間重修的《大清一統志》，在漢陽北部有兩座重要的湖泊：一是位於漢陽縣北十里的瀟湘湖，一是距離約二十五里的三淪湖。瀟湘湖的湖水南流分為兩支：一支東向從楊林口注入漢水，另一支偏向西南，亦注入漢水。《大清一統志》還特別補上一筆，表示當水漲時節，瀟湘湖上「遊船如織」。[109]

然而長江圖上之所以沒有標示瀟湘湖，且在漢陽與三淪湖之間，也未見任何其他湖泊的圖樣，恐怕正是因為瀟湘湖在這幅長江圖繪製時尚未形成。尤有進者，我們檢視所有明代相關方志與地圖，並沒有發現任何提及瀟湘湖的記載與圖繪。例如在《湖廣總志》(1591) 和《漢陽府志》(1613) 中都不見該湖的蹤影。（參見圖二〇、二一）所謂明太祖朱元璋征戰駐足的歷史場景，以及觸景感懷的題詩典故，都祇不過是後人夤緣攀附的傳奇假說。

---

[108] 這恐怕是魏源誤讀范鍇《漢口叢談》的引文所致。《漢口叢談》在援引〈隄防考〉部分論述之後，又轉錄乾隆《漢陽府志》裡的相關記載，而魏源的案語似乎將之混一。

[109]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史館藏清道光二十二年進呈寫本影印），卷三三八，頁 6775。

圖二〇：漢陽府總圖
（《湖廣總志》〔1591〕）

圖二一：漢陽縣圖
（《漢陽府志》〔1613〕）

如果這座瀟湘湖的確是在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古道淤積後才逐漸形成，當然無法在這幅長江圖上找到它的蹤影。更有進者，即使瀟湘湖的形成源自成化的改道，但恐怕一直到明末，都尚未以「瀟湘湖」的名稱傳世。迨至清初，瀟湘湖才開始受到普遍的關注，並成為文人吟詠流連的景點。這座瀟湘湖又名「後湖」，因為其位於漢口鎮的後方。（參見圖二二）范鍇在他彙整地方掌故的《漢口叢談》裡，曾徵引康熙朝學者彭擬陶的〈後湖竹枝詞〉，描寫入春時，遊人蜂擁流連於瀟湘湖的盛況：

車如流水馬如龍，未怕春寒料峭風。相約瀟湘湖上去，踏青先看燕兒紅。[110]

可見早在康熙年間，瀟湘湖儼然已成當時漢口人們的春遊勝地。當地人開始追索此湖的源起，並與「漢水古道」之說綰合起來，甚至添賦明太祖勒馬賦詩的傳奇，而乾隆《漢陽府志》的相關記載正好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瀟湘湖的認知或遐思。清中葉客居漢口的蘇州吳縣詩人葉廷琯 (1791-1861) 曾自許是「瀟湘湖上一閒鷗」。[111] 他曾描寫漢口鎮背面的後湖，一名瀟湘湖，廣袤數十里，東達黃陂、

[110] 清・范鍇，《漢口叢談》卷三，頁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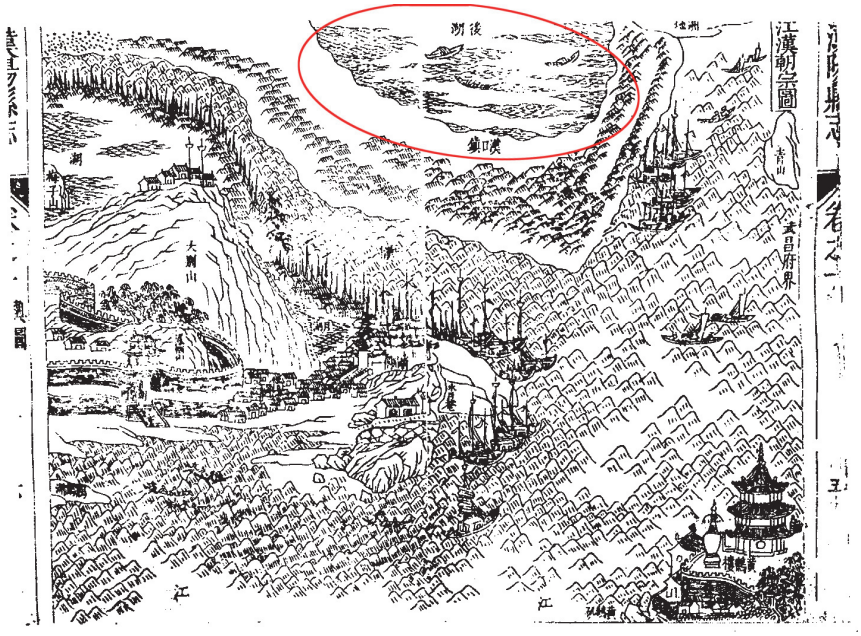
[111] 見陳文述〈喜調生至〉一詩的詩注：「瀟湘湖上一閒鷗（調生前年客漢上有此印章），又

孝感等地。秋冬水涸時人們借地種菜，春天時彌望一片盡皆菜花，因此也稱作「黃花地」。當地土人沿著湖緣設置茶寮，高達數十處之多，等到夏月大雨既行，江流盛漲灌入，這座瀟湘湖轉瞬變成一片無際汪洋。葉廷琯並將瀟湘湖與其原鄉的「具區」（即太湖）相提並比。[112] 在他的〈後湖觀水偶得絕句〉一詩中：

煙波浩渺似瀟湘，誰信春風菜陌黃。欲與麻姑話塵劫，一年一度小滄桑。[113]

貼切地道出瀟湘湖每年隨著季節的流轉，不斷輪迴著滄海桑田的變化。

或許「一年一度小滄桑」，不止是瀟湘湖注定輪迴的塵劫，恐怕也是整個漢水流域，或者說，這片傳說中雲夢遺澤的歷史宿命。



圖二二：江漢朝宗圖（《漢陽縣志》〔1748〕）。後湖（瀟湘湖）位於漢口鎮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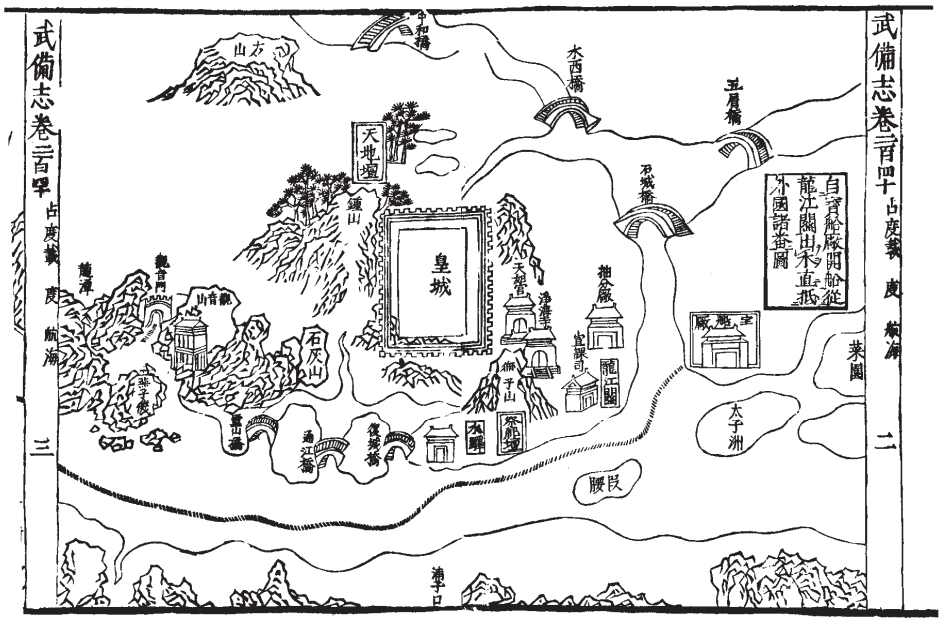
向瀟湘一度游。高詠定知江路穩，長歌聊解客中愁。燕泥跡舊檐牙認，鴻爪痕深屐齒留。惆悵雲萍容易別，片帆送我又歸舟。」氏著，《頤道堂詩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04-1505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道光增修本影印），卷二七，頁 600。案：調生即葉廷琯之字。

112 清・葉廷琯，《鷗陂漁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3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影印），卷五，〈漢口後湖詩〉，頁 22-23。

113 清・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五，〈漢口後湖詩〉，頁 22-23；又見葉廷琯，《楙花盦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刻滂喜齋叢書本影印），卷上，頁 3。葉廷琯在詩題之後，有類似的注解：「漢口後湖一名瀟湘湖，冬春水涸，遍種菜花，故又名黃花地，梅雨漲發則汪洋巨浸矣。」

七・人文化的地理景觀：樓起樓塌・洲浮洲沈

長江圖繪製的目的，是要詳細描繪長江沿岸的行治衙署、軍事部署、交通里程、地方治安與經濟稅收等種種官方建置，因此它和一般方志的城池圖畢竟不同。出現在府縣方志輿圖中的古蹟、廟學或壇祠，往往在長江圖中付諸缺如。[114] 特別值得與這幅長江圖加以對比的一幅圖是：製作年代接近的「鄭和航海圖」。現存「鄭和航海圖」，原收錄於茅元儀 (1594-1640) 編的《武備志》卷二四〇。[115] 該幅「鄭和航海圖」原作「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應是原來鄭和下西洋時繪製的航海圖摹本。（參見圖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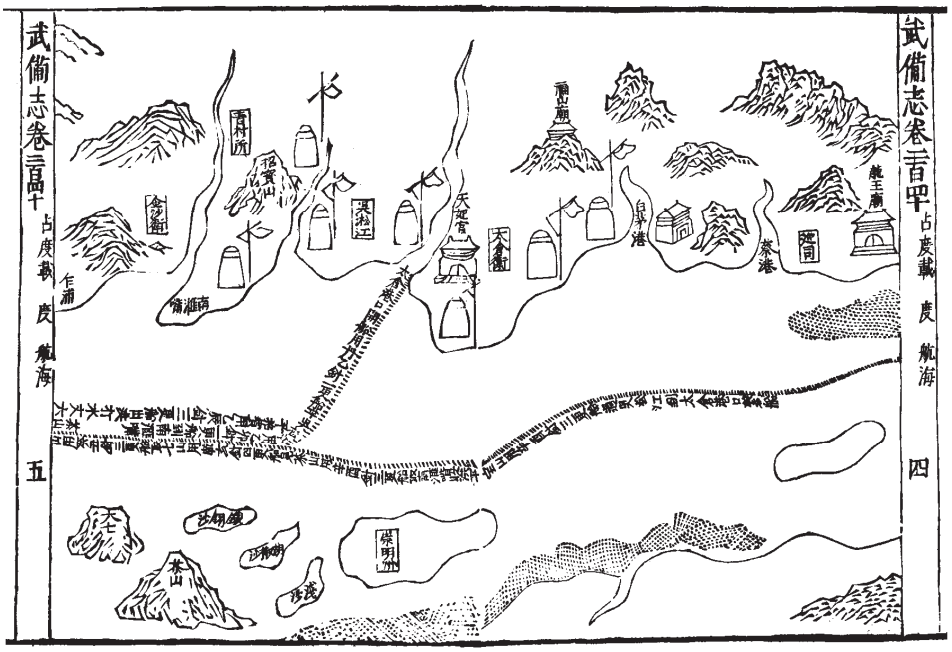
圖二三：「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卷首（出處參註 115）

---

114 張哲嘉曾分析明代方志中地圖所著重表現的視覺特色，強調大多數地方志的輿圖並不以精確度作為繪製時的主要考量，而是多從官僚的視角出發，凸顯代表政治威權與文化正統的據點。參見氏著，〈明代方志的地圖〉，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79-212。

115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武備志》天啟元年的刊本（內有明天啟元年李維楨序）。另有和刻本：明・茅元儀著，鵜飼石齋點，長澤規矩也解題，《武備志》（東京：古典研究會出版，汲古書院發行，1984，據日本寬文四年〔1664〕中野氏覆明刊本復刻），頁 2611-2623。比較和刻本及天啟刊本，兩者在細節上稍有不同。因和刻本圖像較為清晰，故本文採用之。

現存「鄭和航海圖」為黑白臨摹而成，其原本很可能和這幅長江圖一般，以彩繪著色。圖上不僅勾勒沿途自然地理的山川洲港，也詳細標示各地方的行政建置：包括各地的衛所與巡檢司，甚至沿岸的壇廟寺觀，不論是否載於官方祀典，也都一一圖繪具名。（參見圖二四）相較之下，以行政建置為主的長江圖裡，幾乎不見任何壇廟寺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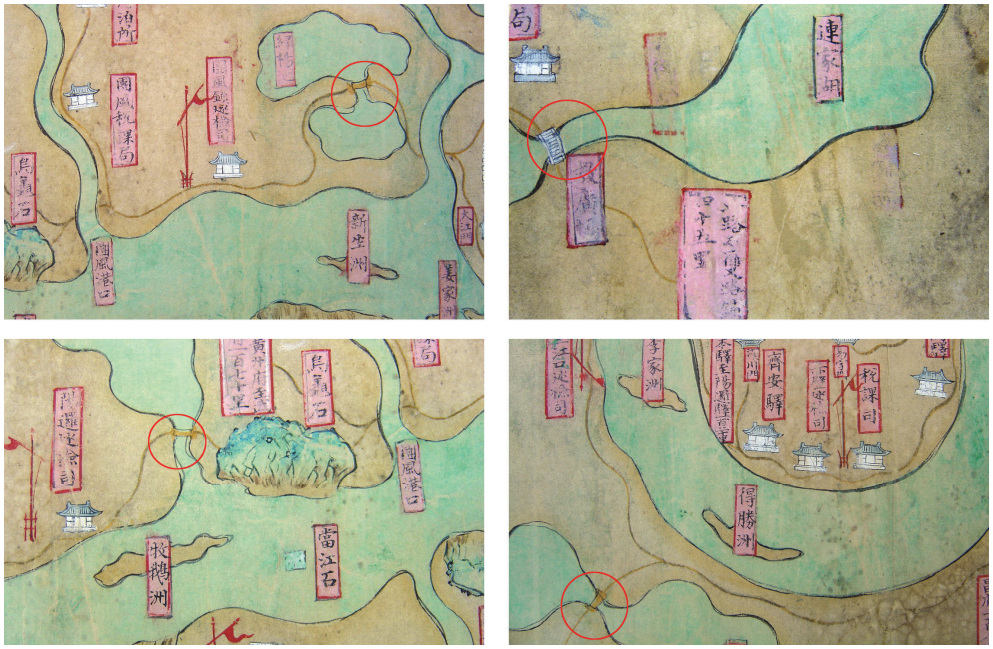
圖二四：「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部分（出處參註 115）

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

這幅長江圖既主要為行政地理而畫，根據繪製的體例，理應不會標定官方壇廟或是民間寺觀的位置。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因此特別值得重視。例如長江圖在岳州府臨湘縣縣境內，有一陸路跨過連家湖西南，不僅畫有橋樑，並且標示「教廣橋」的字樣。比較「鄭和航海圖」上，同樣川流眾多，陸路跨河過湖的津樑不計其數，航海圖都一一著錄橋名，但長江圖上雖有繪出橋樑的位置，但多未標示橋名。因此這座「教廣橋」特別耐人尋味。（參見圖二五）

臨湘縣地方志的編者對這座教廣橋的創始年代，表示已無從查考。不過「教廣春水」早已成為當地八大美景之一，與它所橫跨的連家湖的「連湖夜月」齊

名，不少詩作在當地傳誦一時。[116] 這座「教廣橋」後來在嘉靖十六年 (1537) 時，由知縣尹仲儀捐俸，並合邑士大夫在兩岸砌石建基，然後以木架板鋪造橋，橋上覆亭九間。橋的東邊建立一座觀音堂，西側建樓，並存碑刻，從此改名為「永興橋」。[117] 此亦可佐證長江圖的繪製必然早於嘉靖十六年。



圖二五：長江圖上諸橋標示圖，右上「教廣橋」為唯一著錄名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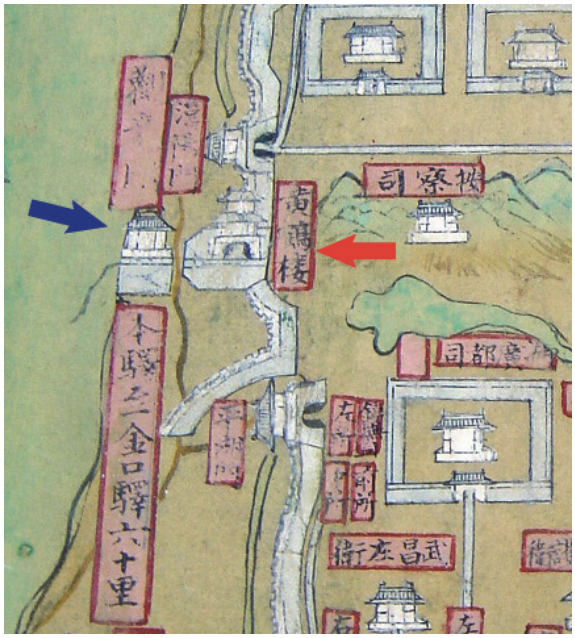
位於這份長江圖殘卷中心的武昌府城裡，也標有兩座特殊的建築物：一是觀音閣；一是黃鶴樓。（參見圖二六）武昌的觀音閣雖歷史悠久，閣內安奉銅鑄觀音像，或稱「頭陀寺」、「竹林寺」，可是長江沿岸城市多有奉祀觀音的廟宇，何以長江圖的繪製者唯獨鍾情武昌的觀音閣，而特別將之標示出來，頗耐人尋味。目前唯一與之相關的線索是《明實錄》上的記載：永樂五年 (1407)，湖廣武昌府的僧人曾表示希望「增脩觀音閣以祝聖壽」，但未被明成祖所接受。明成祖並降諭表示：「人修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哉？」[118]《實錄》這段記載固然意在

[116] 清・楊敬儒修，清・楊柱朝纂，康熙《臨湘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8 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頁 431-440。

[117] 康熙《臨湘縣志》卷二，頁 357。

[118]《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七，「永樂五年五月」，頁 935。觀音閣在明末亦遭毀壞，直到

凸顯成祖的賢明睿智，不藉修廟祈福，惟務修政行善。不過值得推敲的是：顯然並非天下任何住持都得以祝嘏聖壽為名，要求增修寺廟。觀音閣顯然與皇室，甚或永樂帝本人有特殊的關連。這幅收藏於內閣的長江圖既然繪製於永樂六年之後，圖上又特別標出「觀音閣」，負責製圖的單位或許對其間因緣有一定的瞭解。可惜以此孤證僅能停留在揣測階段，尚待將來考掘出更多的史料進行研判。



圖二六：長江圖上的觀音閣與黃鶴樓

根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的記載，後來正德年間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在重修黃鶴樓之後，也捐貲整飭觀音閣。[119] 可見在朝廷命官的眼裡，儘管兩者的文化象

清順治年間才由地方人士重修。

[119]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1522) 卷二，頁 139。關於當時重修黃鶴樓的過程，參見沈鍾，〈重修黃鶴樓記〉，明・孫承榮纂輯，王啟興等校注，《明刻黃鶴樓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頁 370-373。必須澄清的是：《明刻黃鶴樓集》原本現藏於湖北省圖書館，刊行的校注本對研究者提供參考的便利。不過校注本的註解有不少訛誤，需謹慎辨別。即以沈鍾〈重修黃鶴樓記〉一文為例，該文大抵是明代修建黃鶴樓最早的紀錄。文中提及「今年春否傾泰復，民物漸至熙洽，古燕杜公以大中貴適奉璽書而來，蒞鎮於茲。」校注者因查得《明史・神宗本紀》載萬曆二十九年三月「武昌民變，殺稅監陳奉參隨六人，焚巡撫公署」以及「夏四月乙酉，徵陳奉還，以守備承天中官杜茂代之」等，便據此判斷沈鍾文章中所指的「杜公」是杜茂，從而斷定該文作於萬曆二十九年 (1601)。事實

徵意涵不同，觀音閣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黃鶴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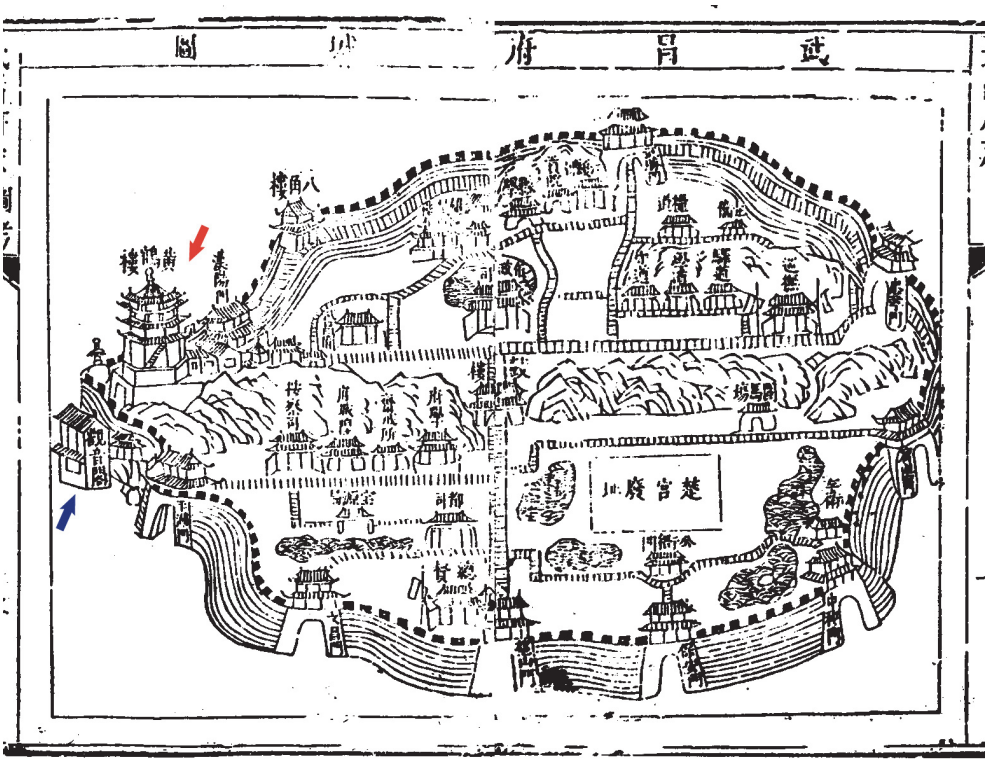
黃鶴樓無疑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文化地標。而它之所以成為千古名樓，實得自歷史與地理的因緣造作。正所謂「武昌形勝雄天下，有此江山有此樓」。黃鶴樓既位居天下形勝的要津，便註定它依附於時局興衰更迭的宿命；既得以坐享盛世成王的榮寵，也容易淪為亂局敗寇的犧牲。明初大儒方孝孺 (1357-1402) 曾一語道破黃鶴樓作為時代興衰的指標意涵：「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方孝孺同時指證：在元末諸侯相持之時，武昌淪為盜莽之區，「屠傷殺戮至於雞犬」，因此「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120] 而元代的黃鶴樓恐怕也隨著元朝的覆滅同歸於盡，元明之際的楊基 (1326-1378) 曾經慨嘆「樓今已槌碎，瓦礫三千秋」。[121] 不過最遲到了洪武五年 (1372) 當楊基出使湖廣時，黃鶴樓應已重建完成，因此楊基曾數次於冬日造訪，登樓欣賞「百尺欄干滿江雪」的美景。[122] 這幅長江圖在繪製之時，黃鶴樓顯然已經重建，再度矗立在龜蛇並峙、江漢合流的黃鵠磯上。

上，根據沈鍾的墓誌銘，原籍江蘇上元的沈鍾於天順四年 (1460) 獲得進士，且享年八十三歲，見魯鐸，〈沈公墓誌銘〉，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九五，頁 67。一四六〇年獲得進士的沈鍾，恐怕不可能再活上一百四十多年，提筆為記。其實沈鍾文中提及節公帑羨餘以修黃鶴樓的「杜公」，應為正德十一年 (1516) 由河南返京後轉任湖廣的杜甫。〈重修黃鶴樓記〉一文當即作於是年。因此沈鍾才會在文章結尾表示，當杜甫邀請他為修樓作記時，已經是「休老林下，略事鉛槧」。

120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 254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明嘉靖辛酉王可大台州刊本影印），卷一八，〈書黃鶴樓卷後〉，頁 7。

121 明・楊基，《眉菴集》（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集部第 61 冊），卷四，〈黃鶴生歌贈王錄事叔明〉，頁 4。原書「搥」作「槌」。

122 明・楊基，《眉菴集》卷三，〈雪中登黃鶴樓〉，頁 5-6。楊基另有〈雪中再登黃鶴樓〉，《眉菴集》卷三，頁 6-7。



圖二七：武昌府城圖（《湖廣武昌府志》〔1687〕）

在文本傳統中，黃鶴樓與鸚鵡洲兩者經常相提並舉，猶如孿生對仗的典故。從唐代襄陽詩人孟浩然 (689-740) 的「昔登江上黃鶴樓，遙看江中鸚鵡洲」開始，[123] 例句俯拾即是。方孝孺於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奉勅「西下巴川持使節」，便是沿著長江前往巴蜀。他並將途中「眼中歷歷如經遊」的如畫江山寫成〈江山萬里圖〉一詩，其中也提及他駐足「地轉多遺跡」的武昌時，「扶醉曾登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124]

中古時期的鸚鵡洲應有相當的面積與規模，唐代不少詩人都曾夜泊鸚鵡洲。[125] 隋代的鸚鵡洲上甚至可以屯兵數萬。[126] 宋代詩人陸游 (1125-1210)〈入

[123] 唐・孟浩然，《孟浩然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重印），卷二，〈鸚鵡州送王九遊江左〉，頁 1。

[124]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四，〈江山萬里圖〉，頁 8-9。

[125] 例如唐・錢起有詩〈夜泊鸚鵡洲〉：「月照溪邊一單蓬，夜聞清唱有微風。小樓深巷敲方響，水國人家在處同。」氏著，《錢考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13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明活字本重印），卷一〇，頁 7。又如白居易〈夜聞歌者・宿鄂州〉中描寫停

蜀記〉中也提到他當離開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時，看到「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127] 當時的洲島高出地表，不僅草蔥木鬱，甚至還有祠宇聳立其間。一直到明初，似乎都還看得到鸚鵡洲上的人煙，楊基走訪武昌時，便曾目睹「人家鸚鵡洲邊住，一向開門對漢陽」。[128] 洪武初年成為進士的廣東順德孫蕡 (1334-1389) 在過往武昌的題詩中，描繪所見「武昌城頭黃鶴樓，飛簷遠映鸚鵡洲」。他隨後先於「日落放船鸚鵡洲」，才再「櫓聲搖月下黃州」。[129] 可見孫蕡在世的洪武年間，鸚鵡洲不僅清晰可辨，而且來往船隻常停泊洲岸，作為訪遊的勝地，或是行旅的中繼站。

不過，黃鶴樓每因人事而興毀無常，鸚鵡洲則必須與自然造化搏鬥。一般認為鸚鵡洲要到明末崇禎年間才「蕩絕無存」，[130] 但恐怕就在這幅長江圖製作的永樂、宣德年間，鸚鵡洲就已經是載浮載沈。魏源在其著名的《禹貢說》裡，徵引范鍇《漢口叢談》認為「漢口」最初本為「蘆洲」的說法，但轉下斷語：「漢口鎮，本一蘆洲耳，即古之鸚鵡洲」。隨後又援引〈隄防考〉，也指證「崇禎末，又將鸚鵡洲衝斷。漸欠坍刷無存」。[131] 對照這幅長江圖，魏源直指漢口鎮為古代鸚鵡洲的斷論，恐怕無法成立。何況誠如孟浩然在黃鶴樓上憑欄遠眺的景象，鸚鵡洲向以江中洲島的風貌名世，而非以江岸沙洲的樣態現身。[132]

泊於鸚鵡洲時見一少婦夜哭：「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徹。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如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見氏著，《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23 冊，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日本翻宋大字本重印），卷一〇，頁 16。

[126]「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唐・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四五，頁 1239。

[127] 清・朱彝尊，《詞綜》（臺北：世界書局，1962）。

[128] 明・楊基，《眉菴集》卷一一，頁 20。

[129] 明・孫蕡，《西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1 冊），卷六，〈次黃州〉，頁 10-11。

[130] 清・胡渭，《禹貢錐指》（收入《歷代禹貢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第 7 卷，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頁 16。

[131] 清・魏源，《禹貢說》卷下，頁 28。

[132] 可能一直到元代，鸚鵡洲都仍以島洲的形式座落於江心。宋元之際浙東史學家胡三省 (1230-1320) 在《資治通鑑・梁紀》中提及「王僧辯軍至鸚鵡洲」條下，特加註解：「鸚鵡洲在江夏江中，昔黃祖使禰衡賦鸚鵡賦於此洲，因以得名，洲之下即黃鵠磯。」胡三省此註雖針對南朝梁將王僧辯 (?-555) 之事，但他的註解，不僅說明鸚鵡洲得名的歷史典

嘉靖《漢陽府志》的方域志裡提及鸚鵡洲時，特別援引戴金 (1484-1548) 關於鸚鵡洲位址變遷的論點：

> 洲聚於沙而沙摶於水也。漢晉以前，橫亘於鄂尾，接鶴樓下。逮國初徙於漢濱。每經世復有消長，革而復營，或逆爲汜，別爲沱，隨時異狀，若神物。[133]

戴金是湖廣漢陽人，曾官拜兵部尚書，對故鄉風土的變遷掌故自是耳濡目染。中古漢魏之前，橫亙大江中的鸚鵡洲，原本貼近黃鶴樓矗立的黃鵠磯下端，與黃鶴樓兩相對位，彼此呼應。隨著江漢匯流等水文的變化，鸚鵡洲其實一直在持續地消長之中。在明朝初年，鸚鵡洲已然從武昌（鄂尾）南下漂移，反而更靠近漢陽（漢濱）。在戴金之世，鸚鵡洲恐怕已經沈浮於大江之中，形蹤難辨，然或許出自一片繾綣鄉情，戴金特別將之擬若「神物」，為鸚鵡洲重現的可能性，留下冀望的伏筆。

在這幅長江圖上，儘管有文字標示出「鸚鵡洲」的位置，並且勾勒出鸚鵡洲的形狀，但和其他江湖上沙洲皆繪以土色的處理不同，其顏色反而與江水混同。這恐怕不是繪圖者大意的筆誤，而應該是當時實際觀測度量的寫真。比較長江圖上其他的江中洲，皆與陸地設色相同，唯獨鸚鵡洲僅有線界（參見圖二八），可見當時鸚鵡洲已然在江中載浮載沈，僅能隱約辨其形狀。長江圖中的主角既然是長江天塹，而水陸交通乃是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描摹山川形勢時，當然會對大江險隘之處多所留意。[134] 因此不論是沈浮於江心，或是錯落於江岸的磯石，從位置到形勢，無不一一列舉。長江圖的製作既為了行政上的實際需要，因此勾勒這座在江中載浮載沈的鸚鵡洲，並非純粹出自保存文學典故的浪漫與想像，更重要的可能是水路行船安全上的關注與考量。

故，也指出在他當時（宋元之際）鸚鵡洲的實際地理位置，以供讀者憑認。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一六三，〈梁紀・太宗簡文皇帝上〉，「大寶元年」，頁 5034。

133 嘉靖《漢陽府志》卷二，頁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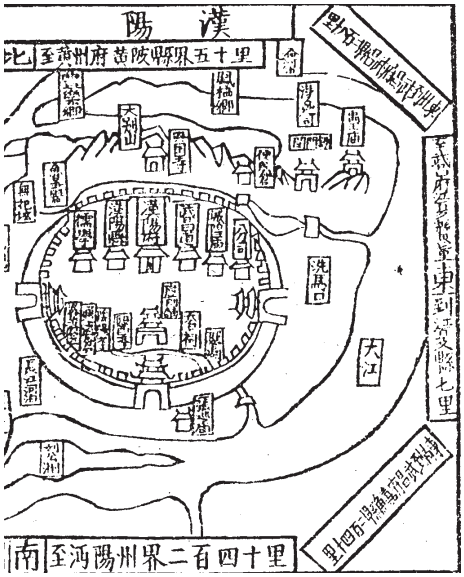
134 清代在編輯《漕運全書》，即有類似的考量。例如《戶部漕運全書》便備載所有各省河道的險隘名目，而且明定：「各省河道經行漕船，如遇險隘地方失風者，非人力所能防範，失防職名，準其免議。」參見清・福趾，《戶部漕運全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36-838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影印），卷四六，「漕運河道」。

圖二八：比較長江圖江中各個島洲的描繪，右上鸚鵡洲的設色明顯與江水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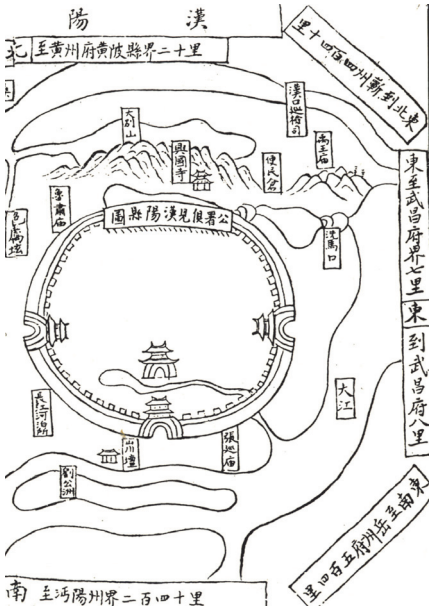
圖二九：清「長江圖」部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在圖左漢陽府城的下方，原鸚鵡洲的遺址處有「鸚鵡洲今沈」的註記

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靖年間方志的地圖中，多不見鸚鵡洲的蹤影。（參見圖三〇、三一）印證當時的詩作，例如嘉靖年間的徐中行 (?-1578) 曾在黃鶴樓上與友人會宴，並在憑弔以〈鸚鵡賦〉傳世之東漢名士禰衡 (173-198) 的詩中坦言：「江漲洲長沒，春來草不生」。[135]

但在萬曆年間的方志中，鸚鵡洲卻赫然再度浮現。（參見圖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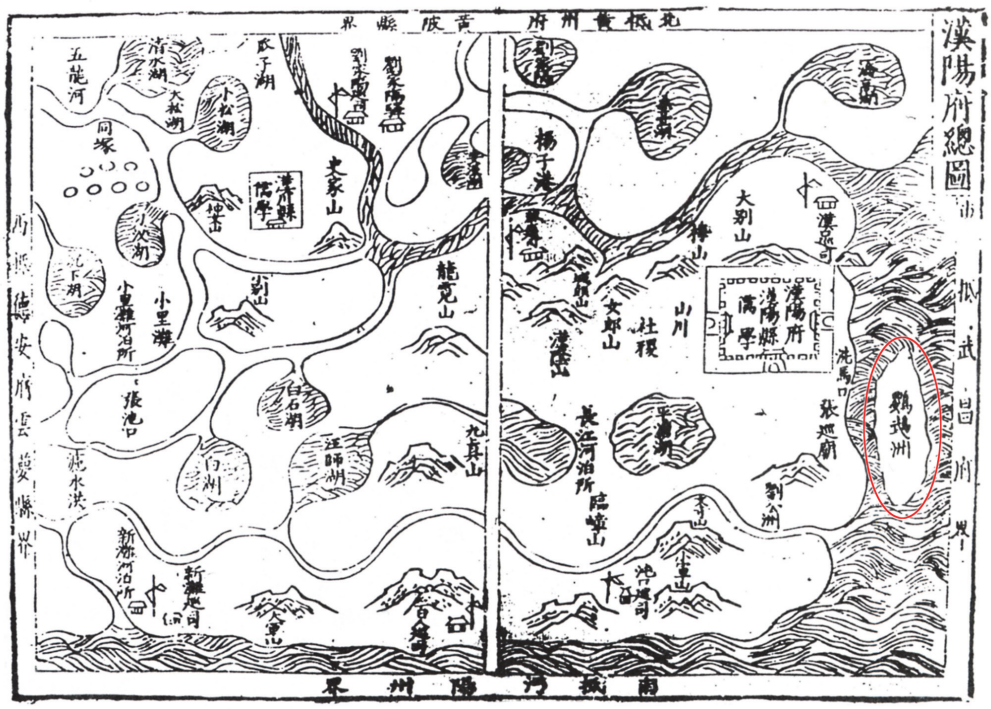


圖三〇：漢陽府圖
（《湖廣圖經志書》〔1522〕）



圖三一：漢陽府圖
（《漢陽府志》〔1546〕）

[135] 明・徐中行，《天目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49 冊，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卷五，〈讌黃鶴樓賦得禰衡二首贈吳生虎臣〉，頁 9-10。



圖三二：漢陽府總圖（《湖廣總志》〔1591〕）

這當然不是編者憑空捏造，萬曆年間獲致進士的王士性 (1547-1598)，一生遊歷無數名山大川，在其《五岳遊草》裡便描寫他登上「雕欄畫棟，麗譙無競巧于此」的黃鶴樓：

坐對晴川，丹朱在目。鸚鵡洲浮其上，漢水自西來，數千里注其下。[136]

萬曆年間武昌知府孫承榮所纂輯的《黃鶴樓集》也指出：當時的鸚鵡洲「故江水渺漫，往不恆見」。當地還流傳一種讖語：若見鸚鵡洲出，則武昌府中有人會得中高第。就在孫承榮擔任武昌知府的時候「水落沙明，洲壇蜿如偃月」，甚至洲上的灞陵橋偶爾還露出故址，「好事者間攜酒游其上」。[137] 不過，一度重現於萬曆年間的鸚鵡洲，恐怕也只是曇花一現。約略同時的文史名家王世貞 (1526-1590) 說得好：「君莫問鸚鵡洲，滔天白浪誰能識？」當時的鸚鵡洲大概僅出沒

[136] 明・王士性，《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251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1691〕馮甦刻本影印），卷六，〈楚游上〉，頁 13。

[137] 明・孫承榮，《明刻黃鶴樓集》，頁 395。

在詩人依稀彷彿的辨識與想像中：「縹緲高憑崔氏樓，依微西眺禰生洲」。[138]「崔氏樓」指得是崔顥（約 704-754）題詩的黃鶴樓；「禰生洲」則是禰衡喪身的鸚鵡洲。懷古的雅士若真要尋蹤覓跡，探訪那一度挺立於江心的鸚鵡洲，勢必要敗興而返，安希范 (1564-1621) 就曾在〈皇華游歷記〉裡，提及其於萬曆十七年 (1589) 五月遊武昌，登黃鶴樓，隨後又過江至漢陽，上晴川閣。但幾度眺望鸚鵡洲的蹤影，卻只見「水沒。無復芳草萋萋之感」。[139] 就連生於斯、長於斯的當地文人，一生恐怕也難得窺見鸚鵡洲浮現水面。萬曆十一年獲登進士的江夏人郭正域 (1554-1612)，從小便在武昌城南傳說是鸚鵡寺的故址嬉戲。後來鸚鵡寺重建，邀請他撰寫碑記，他在〈重建古鸚鵡寺碑〉一文中不禁情隨景遷，感慨繫之：

> 夫以衡之才，緣賦鸚鵡見；而洲之勝，又緣衡賦鸚鵡見。今寺又以鸚鵡名。廼衡卒累於才，而洲亦淪没於江，至今不可踪跡。[140]

元明之前的訪客不僅可以登上黃鶴樓，憑欄眺望江中鸚鵡洲的芳草萋萋，甚至可以泊舟於洲畔追昔撫今。迨至明代，文人的詩作往往隨著洲浮洲沈而或歡吟、或悲詠。進入清代，風雅的過客大概只能從江岸、船上或樓中憑弔已經「蕩絕無存」的鸚鵡洲。當然，鸚鵡洲的覆沒並不能阻止騷人墨客繼續在憑眺中憑弔。曾為康熙皇帝捉刀的詩人查慎行 (1650-1727) 登上漢陽的晴川閣時便下筆感嘆：「已失當年鸚鵡洲，晴川高閣劫灰留」。[141] 清初攻臺功臣施琅 (1621-1696) 的長子施世綸 (1658-1722)，也約略在同一時期登上對岸武昌的黃鶴樓瞭望：「縱目江山了，芳洲黯淡容」。[142] 兩位清初的名人分別從兩岸著名的樓閣俯視大江，都不禁慨嘆陸沈的鸚鵡洲渺無蹤影。

當然，不論樓起樓塌、洲浮洲沈，騷人墨客仍可隨著景物的興蕪存毀起興抒懷。洲沈之後，詩人仍可以憑空遠眺，感嘆「空憐鸚鵡連洲歿，不見仙人駕鶴

---

[138]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1976，據明萬曆間〔1573-1620〕世經堂刊本影印），卷二一，〈楚游歌贈顧季狂〉，頁 10-11。

[139] 明・安希范，《天全堂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安吉校刊本），卷二，〈皇華游歷記〉，頁 2。

[140] 明・郭正域，《合併黃離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 13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史記事刻本影印），卷二二，〈重建古鸚鵡寺碑〉，頁 14-15。

[141]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83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卷一，〈漢陽晴川閣〉，頁 9。

[142] 清・胡丹鳳編，《黃鵠山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退補齋刊本影印），卷八，頁 4。

回」。[143] 也許從小浸淫於鸚鵡洲典故中長大的郭正域，比較能釋然地看待這座被各種典故層建壘砌的鸚鵡洲。他在〈重建古鸚鵡寺碑〉一文中表示：「文章伎倆，皆幻心也；山河大地，盡迷妄也」。對他而言，從禰衡、鸚鵡賦、鸚鵡洲到鸚鵡寺，所有「人之才不才、鳥之言不言、洲之沒不沒、寺之燬不燬」，都不過是在幻與非幻、妄與非妄的一念之間。[144] 也許直到今天，對登樓的懷古訪客而言，移建的黃鶴樓雖改而未改，杳沒的鸚鵡洲雖沈而未沈。眼前的實景不過是參考的座標，訪客在眺臨指劃之間，總會揣摩起那座曾經屹立在滾滾長江與滾滾歷史洪流中的鸚鵡洲。

而這幅註記歷史片段的長江圖，恰好見證了鸚鵡洲覆滅前向南游移的軌跡，以及最後掙扎時載浮載沈的身影。彷彿也預示禰衡懷才不遇的千古憾恨，終將沈入大江，付諸東流。

結論：歷史中的地圖與地圖中的歷史

地圖捕捉定格的歷史，但也成為某一段歷史時期的俘虜。有限的壽命正是地圖的宿命，「地圖是鑲嵌在其所協助建構的歷史裡」；[145]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歷史的線索也被鑲嵌在地圖裡」。因此本文一方面試圖斷定這幅長江圖在歷史座標裡的位置，一方面也試圖考掘這幅長江圖中所可能蘊含的歷史線索。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古代的行政機關一般都要使用大型且精細的地圖。而這種地圖製作的份數有限，一旦內容更新的地圖出來，失去參考價值的舊圖便被取代。反而是一些小型的、內容簡略的地圖，因實用上的需要而傳抄保留下來。日本地圖學者海野一隆 (1921-) 認為這是地圖史上「精亡粗存」的現象。[146] 不過，這僅是針對地圖的流傳與應用而言。在時空的變遷中，任何地圖畢竟都有壽命，過去鉅型且精密的地圖，往往需要仰賴國家機器的動員，才有可能進行考察、測量與繪製。儘管流傳不廣，但也是在官方機構的庋藏下得以保存至今。目

---

[143] 單烺，〈漢口〉，清・符葆森輯，《國朝正雅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咸豐六至七年〔1856-1857〕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

[144] 明・郭正域，《合併黃離草》卷二二，〈重建古鸚鵡寺碑〉，頁 14。

[145] 此借用 Denis Wood,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2) 裡第二章的標題：“Maps are embedded in a history they help constructed,” p. 28.

[146]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香港：中華書局，2003），頁 7。

前考古所見中國最早的地圖，是一九八六年在甘肅省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地圖，大抵繪製於公元前四世紀，地圖涵蓋當代天水市伯陽鎮以西北的渭河流域，以及秦嶺以南花廟河的上游地區。[147] 至於一九七三年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與「駐軍圖」，根據墓葬年代（漢文帝十二年；168 BC）推敲，該圖距今兩千一百多年。[148]

我們的研究策略是先「按驥索圖」——從地圖上已知的線索下手，透過志書相關記載的對勘，以圖上已標示或未註記的建置，試圖將地圖製作年代的上下範圍加以斷限。大略確定該圖所能反映的時代之後，再進而「按圖索驥」，與現存的書寫與圖像資料進行對比，試圖挖掘這幅地圖所蘊含的歷史資源：包括該段歷史時期自然環境的變遷或人文地理。

本文從點的建置、線的水路交通，到面的自然形勝，對這幅長江圖殘本進行解讀。製圖年代的斷定當然是首要之務，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探掘該長江圖所蘊藏的研究價值，並逐一檢視相關制度建置的更迭與地理景觀的變遷。如果本文考定的年代無誤，這幅長江圖的繪製年代範圍，應可縮限在永樂六年 (1408) 至宣德五年 (1430) 之間。這幅長江圖可能是現存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中最早的一份史料，[149] 更重要的是：作為世上現存最早的明代長江地理彩圖，[150] 學者當可以從中釐清或藉以檢校傳世文獻中闕如或含糊的相關紀錄。

---

[147] 參見張修桂，〈放馬灘戰國秦墓出土古地圖〉，氏著，《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19-554。按：該圖共有七幅，分別繪在四塊大小相等的木板上。

[148] 參見譚其驤，〈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文物》2 (1975)；〈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文物》6 (1975)；另見張修桂，〈馬王堆漢墓出土古地圖〉，氏著，《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頁 437-518。

[149] 根據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室目前整理的階段性成果，館藏中年代最早的兩件檔案是在宣德二年 (1427) 三月二十二日所頒發的敕諭：一是「敕諭朝定寺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人等」，編號 038107-001；一是「敕諭西寧鈕爾溝寺」，編號 038108-001。兩份檔案皆曾收錄於《明清史料・庚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頁 801；以及李光濤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頁 1-2。而長江圖極可能是在宣德之前所製作。

[150] 明代傳世最重要的輿圖，當推江西吉水的狀元羅洪先 (1504-1564) 參酌元人朱思本 (1273-?)「計里畫方之法」，進而繪製的「廣輿圖」，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圖集。海野一隆先生對該廣輿圖曾進行系統的考察，包括其各種版本的流傳、與朱思本繪圖的沿承關係，以及對後來海內與國外輿圖製作的影響。參見海野一隆，《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東京：東洋文庫，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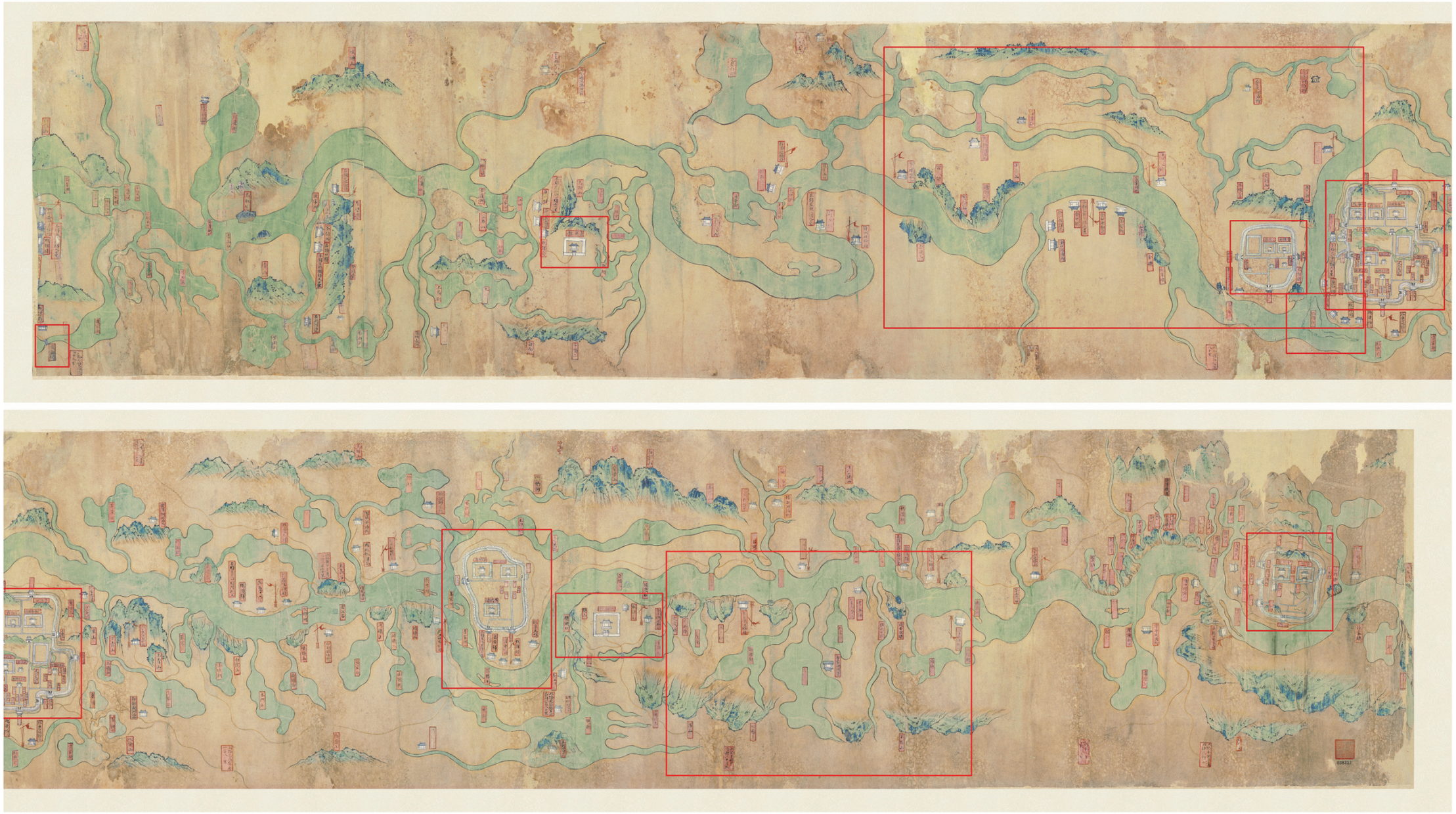
特定的時間封存在特定的空間裡。一旦推定這幅長江圖製作的年代，無疑同時宣判這幅圖的時效性。當然，也許對明代宣德以後的中央官員而言，隨著衛所、驛站與巡檢司的興革改制，這幅長江圖逐漸失去行政上的參考價值。但對歷史學者而言，這幅長江圖卻足以反映出長江水系在這段時期的發展與變化，並具象地展現明代早期長江流域的行政佈局、人文地理與自然景觀。這一幅長江圖儘管缺首殘尾，但彌足珍貴，對明代初期長江水文的變化、武漢區域的發展、甚至文化地標的消長，都提供了印證、釐清與修訂的關鍵訊息。

歷史的線索原藏在地圖上每一筆勾勒或設色的細節裡。

（本文於民國一〇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收稿；一〇一年六月十四日通過刊登）

後記

拙文從構思、撰寫、修訂以迄付梓，稽延經年。研究開展之初，特別感謝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提供審視圖檔的方便，筆者得以鉅細靡遺地一一辨識圖上的人文建置與自然景觀。隨著圖上線索的比對與相關史料的判讀，筆者大膽地將該圖的製作年代逐步向明初推移，參證所需的明代志書多無法逕從現有的資料庫檢得，期間仰賴高君和將所遍搜窮檢的史料逐條製表輸入，筆者遂得以在此長編的基礎上，與各種歷史線索進行交叉比對。本文論證需以大量圖檔以為勘照，亦曾煩請林憶梅、紀智閔與侯京吾等人分別進行影像掃瞄與後置處理。文稿修訂過程中，承蒙于志嘉女史、李新峰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學者先後提供極為寶貴的建言。定稿付梓之前，更先後得葉天賜、范玫宜、黃翊峰、施亞霓與集刊兩位編輯助理的細心校核，謹此衷心銘謝。惟本文所有舛誤缺失，筆者責無旁貸。



圖三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室藏「長江圖（殘卷）」（紅框標示處為本文局部討論所引之附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 123 冊，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日本翻宋大字本重印。

唐・孟浩然，《孟浩然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據上海涵芬樓借景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重印。

唐・錢起，《錢考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13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明活字本重印。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明・不著撰者，《秘閣元龜政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史部編年類第 13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影印。

明・不著撰者，《寰宇通衢》，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6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影印。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4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明嘉靖辛酉王可大台州刊本重印。

明・王士性，《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251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 (1691) 馮甦刻本影印。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1976，據明萬曆間 (1573-1620) 世經堂刊本影印。

明・安希范，《天全堂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安吉校刊本。

明・李東陽等奉敕著，明・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明・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東京：汲古書院，1989。

明・李賢等修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影印。

明・茅元儀著，鵜飼石齋點，長澤規矩也解題，《武備志》，東京：古典研究會出版，汲古書院發行，1984，據日本寬文四年 (1664) 中野氏覆明刊本復刻。

明・孫承榮纂輯，王啟興等校注，《明刻黃鶴樓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明・孫蕡，《西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1231 冊。
明・徐中行，《天目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49 冊，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
明・秦金，《安楚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 433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明・郭正域，《合併黃離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 13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 (1612) 史記事刻本影印。
明・陳全之，《蓬窗日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10 冊，據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祁縣知縣岳木刻本影印。
明・陳循等編，《寰宇通志》，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47，第 37-79 冊，據明初刊本影印。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6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 (1570) 刻本影印。
明・黃汴，《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又名《士商必要》），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子部叢書類第 82 冊。
明・黃福，《黃忠宣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27 冊，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馮時雍刻本影印。
明・楊基，《眉菴集》，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集部第 61 冊。
明・趙寬，《半江趙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42 冊，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 (1561) 趙寬刻本影印。
明・劉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術數類第 60 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影印。
明・羅欽順，《整菴存稿》，收入《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 345-346 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清・朱彝尊，《詞綜》，臺北：世界書局，1962。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83 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
清・查繼佐，《罪惟錄》，收入《四部叢刊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 14-16 冊，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手稿本。

清・胡丹鳳編，《黃鵠山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史部地理・山水，據清同治十三年 (1874) 退補齋刊本影印。
清・胡渭，《禹貢錐指》，收入《歷代禹貢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第 7 卷，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清・范鍇，《漢口叢談》，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華中地方湖北省第 347 號，據清道光二年 (1822) 刊本影印。
清・張廷玉等著，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清・符葆森輯，《國朝正雅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咸豐六至七年 (1856-1857) 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04-1505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 (1817) 刻道光增修本影印。
清・葉廷琯，《楙花盦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清光緒刻滂喜齋叢書本影印。
清・葉廷琯，《鷗陂漁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63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 (1870) 刻本影印。
清・福趾，《戶部漕運全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36-838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 (1876) 刻本影印。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史館藏清道光二十二年進呈寫本影印。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95-597 冊，據四部叢刊影印稿本影印。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唯一書業中心，1975。
清・顧炎武，《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607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清・魏源，《古微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22 冊，據清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本影印。
清・魏源，《禹貢說》，收入《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一編禹貢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第 7 冊，據清同治六年方氏碧玲瓏館刻本影印。
清・魏源，《書古微》，收入《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二編尚書禹貢篇集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第 6 冊，據清光緒四年刻本影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038312，「長江圖」（殘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174374，「〔山西〕墩堡圖」（殘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038107-001，敕諭朝定寺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人等，宣德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收入《明清史料・庚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頁 80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 038108-001，敕諭西寧鈕爾溝寺，宣德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收入《明清史料・庚編》，頁 80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錢伯城、魏同賢、馬樟根主編，《全明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二・地方志書（依長江圖由左至右）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明・薛剛纂修，明・吳廷舉續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 (1522) 刻本影印。

萬曆《湖廣總志》，明・徐學謨纂修，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94-196 冊，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 (1591) 刻本影印。

雍正《湖廣通志》，清・邁柱等監修，清・夏力恕等編纂，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雍正十一年 (1733) 刊本。

雍正《湖廣通志》，清・邁柱等監修，清・夏力恕等編纂，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31-534 冊。

弘治《岳州府志》，明・劉璣編，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 63 冊，據明弘治刊本影印。

隆慶《岳州府志》，明・鍾崇文纂修，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湖南省第 17 冊，據寧波天一閣藏明隆慶間刻本影印。

康熙《岳州府志》，清・李遇時修，清・楊柱朝纂，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38 冊，據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刻本影印。

乾隆《岳州府志》，清・黃凝道修，清・謝仲壎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第 6 冊，據清乾隆十一年 (1746) 刻本影印。

弘治《黃州府志》，明・盧希哲等修，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湖北省第 16 冊，據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弘治十三年 (1500) 刻本影印。

光緒《黃州府志》，清・英啟修，清・鄧琛纂，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華中地方湖北省第 346 號，據清光緒十年 (1884) 刊本影印。

康熙《臨湘縣志》，清・楊敬儒修，清・楊柱朝纂，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8 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同治《臨湘縣志》，清・盛慶黻、恩榮修，清・熊興傑、歐陽恩霖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 4 冊，據清光緒十八年 (1892) 刻本影印。

正統《嘉魚縣志》，明・莫震修，明・孫允恭纂，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據明正統十四年 (1449) 刊本。

乾隆《重修嘉魚縣志》，清・汪雲銘修，清・方承保、張宗軾纂，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5 冊，據清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刻本影印。

同治《重修嘉魚縣志》，清・鍾傳益修，清・俞焜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0 冊，據清同治五年 (1865) 刻本影印。

嘉靖《漢陽府志》，明・賈應春修，明・朱衣纂，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湖北省第 16 冊，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刻本 (1546) 影印。

萬曆《漢陽府志》，明・秦聚奎修，東京：舊上野圖書館，國際マイクロ寫真工業社，1989，據明萬曆四十一年 (1613) 刊本攝製。

乾隆《漢陽府志》，清・陶士偰修，清・劉湘煃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1 冊，據清乾隆十二年 (1747) 刻本影印。

乾隆《漢陽縣志》，清・劉嗣孔修，清・劉湘煃纂，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6 冊，據清乾隆十三年 (1748) 刻本影印。

同治《漢陽縣志》，清・黃式度修，清・王柏心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4-5 冊，據清同治七年 (1868) 刻本影印。

同治《漢陽縣志校》，清・許盛春、張行簡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5 冊，據清光緒十年 (1884) 刻本影印。

光緒《漢陽縣志》，清・濮文昶、張行簡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5 冊，據清光緒十年 (1884) 景賢書塾刻本影印。

康熙《湖廣武昌府志》，清・裴天錫修，清・羅人龍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2 冊，據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刻本影印。

同治《江夏縣志》，清・王庭禎修，清・彭崧毓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2 冊，據清同治八年 (1869) 刻本影印。

《江夏金石志》，清・彭崧毓纂，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地方類第 13 冊。

萬曆《黃岡縣志》，明・茅瑞徵修，明・呂元音等纂，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光緒十六年 (1890) 重刊明萬曆三十六年 (1608) 修朱印本。

乾隆《黃岡縣志》，清・蔡韶清修，清・胡紹鼐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16 冊，據清乾隆二十年 (1755) 刻本影印。

光緒《黃岡縣志》，清・戴昌言修，清・劉恭冕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17-18 冊，據清光緒八年 (1882) 刻本影印。

康熙《武昌縣志》，清・熊登修，清・孟振祖纂，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湖北第 23 冊，據清康熙十三年 (1674) 刻本影印。

乾隆《武昌縣志》，清・邵遐齡修，清・談有典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3 冊，據清乾隆二十八年 (1763) 刻本影印。

光緒《武昌縣志》，清・鍾桐山修，清・柯逢時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33 冊，據清光緒十一年 (1885) 刻本影印。

嘉靖《蘄州志》，明・甘澤纂輯，明・趙士讓編次，明・王舜卿校正，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湖北省第 16 冊，據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十五年 (1536) 補刻本影印。

康熙《蘄州志》，清・王宗堯修，清・盧紘纂，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湖北第 24 冊，據清康熙三年 (1664) 刻本影印。

乾隆《蘄州志》，清・錢鎏修，清・周茂建等纂，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乾隆二十年 (1755) 刊本。

光緒《蘄州志》，清・封蔚礽修，清・陳廷揚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23 冊，據清光緒八年 (1882) 麟山書院刻本影印。

《蘄州金石志》，清・陳廷揚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地方類第 13 冊。

康熙《廣濟縣志》，清・王玉鉉修，清・王臨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25 冊，據清康熙三年 (1664) 刻本影印。

萬曆《雷州府志》，明・歐陽保等纂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

萬曆《福州府志》，明・林爌等纂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影印。

三・近人論著

于志嘉

1992 〈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頁 515-540。

1999　〈明檔案的利用與明代衛所制度研究〉，《大陸雜誌》99.5：9-26。
方方
2004　《漢口的滄桑往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尹玲玲
2004　《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王偉凱
2006　〈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檢司設置與分布〉，《湖北大學學報》33.3：365-369。
仇潤喜、劉廣生編
1999　《中國郵驛史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
皮明庥等編
1996　《漢口五百年》，武漢：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石泉
1988　《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石泉、蔡述明
1996　《古雲夢澤研究》，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
李光濤
1959　《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吳晗
1937　〈明代的軍兵〉，《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2：147-200。
呂進貴
2002　《明代的巡檢制度：地方治安基層組織及其運作》，宜蘭：明史研究小組。
徐中舒
1998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
張建民
1999　《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修桂
2006　《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哲嘉
2003　〈明代方志的地圖〉，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79-212。

陳熙遠

2005　〈人去樓坍水自流——試論座落在文化史上的黃鶴樓〉，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367-416。

湯黎

2010　《人口、空間與漢口的城市發展 (1460-193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楊正泰

2006　《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樓祖詒

1939　《中國郵驛發達史》，昆明：中華書局。

魯西奇

2000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魯西奇、潘晟

2004　《漢水中下游河道變遷與堤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劉錚雲

1998　〈舊檔案、新材料——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新史學》9.3：135-160。

譚其驤

1975a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文物》2。

1975b　〈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文物》6。

蘇同炳

1969　《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中村治兵衛

1995　《中国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佐藤文俊

1999　《明代王府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

2003　《地圖的文化史》，香港：中華書局。

海野一隆

2010　《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東京：東洋文庫。

Farmer, Edward L.

2000 "The Hierarchy of Ming Walls." In *City Walls: the Urban Enceinte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1-487.

Rowe, William T.（羅威廉）

1984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 Denis

1992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Unravel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Historical Clues in a Tattered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Hsi-yuan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n a damaged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originally created and explores its value as a historical source. The map is part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hile it has been restored, digitized, and made accessible online, portions of the original are lost to us. As a result, it has hitherto been impossible to use a title or cartographer's signature to ascertain its age,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reation, or exactly what it originally contained. For this reason, the document long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and has not been used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Employing a methodology grounded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 this study deduces the unknown based on the known. It identifies each of the bureaucratic establishments indicated on the map, including postal relay stations, fishery tax offices, military inspectorates, military outposts (*weisuo*), and walled towns, and cross-references these with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The paper examines extant record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decommissioning, and relocation of these government establishments, and on this basis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likely range of date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map and to speculate about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made.

Arguably every map possesses an "expiration date" of sorts.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map was created and the history it represents are two faces of the same coin. Therefore, once a temporal coordinate has been fixed for a map, it becomes possible to deduce the document's "expiration date" and thereby explore its history, tracing the details of topographical chan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at transect that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its composition, this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structured around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transport networks, and topographical features, a fact that speaks to its potential value to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ssuming the dating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accurate, the map may serve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contemporary hydrogeograph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the region. It will not only facilitate reevalua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the Han River, but may move back the date that Hankou was built, and even bear witness to the natural vicissitudes of "Parrot Isle," a cultural landmark containing multiple layers of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Yangtze River map,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historical geopolitics, environmental change, cultural landmarks